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身分、利益的解構與建構

On Contemporary Yellow Peril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The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doi:10.30390/ISC.201306_52(2).0003

問題與研究, 52(2), 2013

Issues & Studies, 52(2), 2013

作者/Author：劉蕭翔(Shiau-Shyang Liou)

頁數/Page：99-14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3/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306_52\(2\).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306_52(2).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 —身分、利益的解構與建構*

劉 蕭 翔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橫亘百餘年之久的俄屬遠東黃禍論已是某種或然性規律，不僅未因世局變遷而消弭，今日更成為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的兩難困境與潛在負面變數。本文擬由身分政治角度切入，解構促使黃禍論於冷戰後復萌之無形雙重觀念結構—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除藉以揭示黃禍論的深層蘊含外，亦對其進行中長期預測，希冀藉由建構主義就黃禍論的釋疑，推導「跨層次／情境習得轉化」論點，讓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雙向互動的研究不再僅是某種未落實的隱喻，從而為建構主義中層理論增添新的實徵案例，並作為層次分析學理的補充。

本文認為，俄中兩國間的身分與認知需獲得調和，而俄國內部的疏離以及遠東區當地俄人與中國人間的隔閡亦須趨同，黃禍論方有減輕、緩和，乃至於消弭的可能。然而，兩國當前所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為敵」尚未徹底到位，俄國內部促成黃禍論復萌的離心傾向亦仍俟時而動。各造屬性若未能調和，黃禍論仍將持續與其所依附之雙重觀念結構交錯地建構，其成因亦可能經由社會化而代代相傳。但遠東區俄人與中國人互動多年後，其若干特質與行為卻逐漸與中國人趨同，此或許能補足俄國內部所欠缺之自下而上的建構作用。此外，世代交替亦為俄羅斯再起的希望，俄中兩國的差距若能弭平，黃禍論自亦有望緩和、消弭。

關鍵詞：黃禍論、建構主義、俄中關係、身分、利益

* * *

* 本文曾獲政大出版社「100 年度思源人文社會科學博士論文獎—國際關係學門首獎」與「國科會 98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NSC 98-2420-H-004-023-DR)補助；初稿曾發表於「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六屆博士生論壇」(上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察哈爾學會，2011 年 6 月 1、2 日)。

壹、前言

2001 年，俄中關係已更上層樓為「世代友好，永不為敵」，但其間蟄伏的兩大關鍵變數卻仍揮之不去。其一為物質變數－兩國東段未定界爭議，^①再者為觀念變數－黃禍論（Yellow Peril）：俄羅斯認為中國藉由無形的人口擴張，變相寧靜索回過往領土的疑懼。

俄中兩國自從於遠東接壤後，俄人擔憂中國人滿為患而溢至西伯利亞，乃至於越過烏拉山直抵伏爾加河畔，進而可能危及俄人文化與生存的恐懼即如影隨形地存在。對黃禍的恐懼在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皆然，卻又在俄國尤甚，並影響 18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百年來的俄國遠東政策甚深，未因世局變遷而消弭。^②冷戰後，俄中國力此消彼長，俄羅斯對中國黃禍再起的疑懼益發增長，其中又以在帝俄時期所攫取且感受中國人口壓力最甚的俄屬遠東（the Russian Far East）南部為最。但弔詭且又令人費解的是：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的復萌，卻是在俄中關係於 1992 年至 1996 年間連上三階^③的框架內被渲染而成。

若從理性主義（Rationalism）^④角度觀之，2004 年後俄中東段未定界的勘定，即代表兩國間最不利的物質變數已被排除。正如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遠東歷史、考古與人類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of the Peoples of the Far East）（以下簡稱為遠東民族所）所長拉林（Viktor Larin）所言，邊界的最終勘定讓地方與政治人物得以從愛國主義（Patriotism）中解放，^⑤亦即邊界問題應已無再炒作的空間。復以兩國邊境貿易的高度互賴，雙方自應如彼此宣示的「世代友好，永不

註① 2012 年 2 月，時任總理的普京曾指出，俄羅斯與中國已解決彼此間所有的重大政治問題，包括最重要的邊界問題。參見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普京)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俄羅斯與轉變中的世界)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莫斯科新聞報), No. 33 (27 февраля, 2012), с. 1. 因此，邊界問題有足夠的代表性，作為俄中關係的有形物質關鍵變數。俄中邊界問題自 1964 年以來歷經四次談判，延宕達半世紀之久。中國不但曾以過往的條約不平等為由，拒絕承認今日的邊界，更一度與蘇聯爆發珍寶島戰爭。縱然俄中兩國今日已簽訂邊界協定解決黑瞎子島爭議，但俄國內部仍有中國他日強大後將索回過往領土的疑懼。

註② 劉蕭翔，「論俄羅斯的『恐中症』－以新移民法針對性為例」，*俄羅斯學報*，第 10 期（2012 年 1 月），頁 65、80。

註③ 1992 年，俄中兩國承認相互視為友好國家；1994 年，雙方確認已具備新型態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並且互不首先使用核武，亦不將戰略導彈瞄準對方，澈底結束冷戰時期的敵對狀態；1996 年，兩國宣布彼此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將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各領域的長期合作。

註④ 本文對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Reflectivism）的定義，以柯漢（Robert O. Keohane）的分類標準為依據。參見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98), pp. 379~396.

註⑤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拉林)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опыт,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1 世紀初的俄中區域合作：經驗、問題、前景)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2 (2008), с. 50.

為敵」般地和睦。但 2006 年至 2007 年，正值兩國別開生面互辦以對方為主題的「國家年」時，俄羅斯卻啓人疑竇地通過針對性極強且實質排華的移民法規，^⑥一度挑動兩國的敏感神經，此已證實影響深遠的觀念變數－黃禍論蟄伏仍舊並趁隙而動。新法令造成的衝擊與兩國事後的極力淡化，^⑦顯示問題本質已非理性主義強調物質變數與因果解釋的剖析即能探知。

就俄屬遠東黃禍論何以復萌，迄今已有不少研究。俄人對黃禍的恐懼固然已在其東疆醞釀一世紀之久，但誠如拉林所言，問題的癥結並非俄羅斯與其鄰近中國省分關係的建立，而在於俄國內部能否取得一致合意。^⑧俄人今日的恐懼實出於己所想像，中國海外僑民團體雖已出現於莫斯科（Moscow），但在遠東區尙言之過早。驅使中國人北進的動力主要有二：一為中國國內人口壓力與失業率，另一則為與俄國貿易而迅速獲利的經濟誘因，後者的影響實則更甚，但俄人泰半只關注前者，誤解因此而生。^⑨作者則認為黃禍論係於不同相關面向下產生的迷思。在俄羅斯對外戰略因國際格局驟變而未定之際，黃禍論得以從中復萌，而遠東區與中央之間潛伏的疏離亦同時觸發，並強化遠東區當地的特殊性與參與整合的遲疑。除讓中央與地方彼此視界歧異而屢生扞格外，亦造成中央整體戰略與地方區域發展間的認知衝突。在國際結構與國內結構的交錯制約下，黃禍論迷思於其間應運而生。^⑩今日俄羅斯對中國移民的疑懼，亦即所謂

註⑥ 2006 年 10 月，時任總統的普京下令整頓國內經濟秩序後，俄羅斯聯邦政府即於同年 11 月 15 日頒布第 683 號政府令－「關於 2007 年俄羅斯聯邦境內從事零售貿易經營主體內部使用外國勞務人員的允許比例」（Об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на 2007 год допустимой дол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работников, используемых хозяйствующими субъектами,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м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сфере рознич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表示依據「俄羅斯聯邦外國公民法律地位法修正案」（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авов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 признании утратившими силу отдель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в некотор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第 18 條第 1 項而規定如下：（1）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外國勞工禁止受雇從事酒類（包括啤酒）零售。（2）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外國勞工禁止受雇從事藥品零售。（3）自 2007 年 1 月 15 日至 4 月 1 日，外國勞工受雇於售貨亭與市場從事零售者，不得超過該產業從業人數 40%；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則全面禁止。（4）自 2007 年 1 月 15 日至 4 月 1 日，外國勞工受雇於商店以外場所從事零售者，不得超過該產業從業人數 40%；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則全面禁止。參見“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5 ноября 2006 г. N 683 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6 ноября, 2006, с. 16. 亦即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外國勞工禁止受雇從事酒類與藥品零售；另自 2007 年 1 月 15 日至 4 月 1 日，外國勞工受雇於售貨亭、市場與商店以外場所從事零售者，不得超過該產業從業人數 40%，而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則全面禁止。

註⑦ 可參見劉蕭翔，「論俄羅斯的『恐中症』－以新移民法針對性為例」，頁 66-67。

註⑧ Виктор Л. Ларин, (拉林)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фокусе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中國政策聚焦下的俄屬遠東) *Вестник ДВО РАН*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公報), No. 2 (2000), с. 18-19.

註⑨ Виктор Л. Ларин, (拉林) “Китайск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在遠東的中國移民潮) Виктор И. Дятлов (賈特洛夫) подред., «Мост через Амур» Внешние миграции и мигранты в Сибири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семинара (「跨越阿穆爾」－西伯利亞與遠東的外來遷徙與移民) (М.; Иркутск: Наталис, 2004), с. 109-110.

註⑩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07。

的「恐中症」(Sinophobia)，不僅為俄人古老歷史集體記憶－黃禍的甦醒，又與時俱進地在「人」的基礎上摻入不同要素，蛻變出不同樣貌。^⑪薇絲妮克(Elizabeth Wishnick)則指出，俄國中央與地方領導人雖以安全話語描述中國移民帶來的後果，卻未就所認定的威脅制定緊急政策，如軍事對峙或中斷往來，反倒採取措施逐步規範前來俄國的中國移民潮。此外，俄國政治人物在訪華呼籲促進雙邊合作時，卻又同時安全化遠東區的中國移民議題。^⑫三者基本上皆認為所謂的黃禍論實屬迷思，拉林與作者的研究可劃歸從權力和利益角度的觀察，但前者側重國內面，後者兼顧國際與國內面；薇絲妮克則強調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並側重話語操作與政策間的落差。

從何種角度切入議題並無優劣之分，僅有適宜與否。當前學界多半偏好從權力或利益的角度探討主題，因此強調主體間性的反思可補前者的不足。然而，薇絲妮克以軍事對峙和中斷往來的標準，判定話語和政策存在落差的解讀，在黃禍論的探討裡則似乎不宜。蓋因冷戰已告終結，國際關係思維今日亦起重大變化，若執意以舊日標準檢視現況無異不合時宜。何況俄方後續訴諸法律規範匡正中國移民客工身分的移民法規，其實是相當強勢的作為，幾近將商場市集內所有的中國人趕出遠東區，而非僅是單純的言行落差。其次，若過於強調話語操作亦可能有所偏頗，而忽略其間的結構性制約。

黃禍論今日的復萌實乃多重無形結構性因素所致，正因遠東區今日的開發為結構性桎梏，才造成中國移民客工在當地的不可或缺，以及遠東區自認被中央忽略的認知，而有地方後續操作黃禍論對抗中央之舉。冷戰後兩極體系的突然崩潰，俄羅斯的外交路線為此幾經轉折，彼時主政的大西洋學派(Atlanticism)亟欲融入西方，因而也對黃禍論的復萌樂觀其成。此外，俄中兩國間長達 4,300 多公里的陸地邊界，此一地理因素與冷戰後的國際格局變遷同樣皆為俄羅斯無法改變的外在結構性制約。^⑬因此，結構性的制約不僅存在於俄國內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也並存於俄中關係。是故，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的復萌，在相當程度上係因俄國內部隔閡所致，但實又為國際格局變化下的產物，脫離俄中關係和國際體系變化即無所謂的黃禍論。單一個別結構皆為促成黃禍論復萌的充分條件，但黃禍論卻無法反推至任一單一成因，亦即並非任何單一成因的必要條件，卻又依附於此無形雙重結構。所以，黃禍論除呈現溫特(Alexander

註⑪ 劉蕭翔，「論俄羅斯的『恐中症』－以新移民法針對性為例」，頁 80~81。隨著中國人在遠東區各樣活動的進行，俄人近年對中國人的反感又衍生出不同樣貌。如中國商人即曾被指責對當地傾銷大批帶有致癌物質或污染環境的商品，中國人也被譴責盜伐林木，而此同樣可能導致當地生態災難的發生。在農業方面，中國人也被攻訐使用未獲俄國准許的化學肥料而污染俄國環境，更遑論邊界走私與彼此對互訪遊客的人身攻擊。

註⑫ Elizabeth Wishnick, "The Securitisation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Melissa G. Curley and Wong Siu-lun eds., *Security and Migration in Asia: the Dynamics of Securitis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83~99.

註⑬ 遠東區的開發局限可參見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頁 111~113；國際面的結構性制約，則可參見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頁 122~125 在國際面的探討。

Wendt) 所言之依附狀態 (supervenience) ⑭外，亦為難解的結構性桎梏，而非僅是安全化與去安全化 (de-securitisation) 其間的歧異所致，故自宜從結構的整體角度觀之。

有鑒於此，本文將以有別於權力和利益的身分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y) ⑮角度，切入黃禍論此一無形觀念。本文同樣強調主體間性，但擬借鑒溫特側重結構之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理論，其間進程與結構變化的微觀層次論證，視前述促成黃禍論復萌之無形雙重結構為觀念結構，重新結合層次分析 (the level-of-analysis) 與建構主義，以及遠赴當地實地考察的第一手資料，⑯剖析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復萌成因裡身分與利益的聯繫，期能從中再現新意，反向分析此橫亘百餘年卻仍舊難解的迷思，並推導其未來可能的變化。

貳、何以解構雙重觀念結構

在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的復萌裡，我們能發現其間有三組能動者 (agent)：俄羅斯中央－莫斯科、地方－遠東區與中國，⑰以及數組關係：國對國的俄中關係、跨國的國家對地方交叉組合、跨國的地方間關係和俄國內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其中，跨國的地方間關係是冷戰後俄中兩國民眾的直接接觸，⑱非但讓俄國內部鼓吹、炒作黃禍論，亦使得俄中關係在前景看好時產生黃禍悖論。

至於跨國的國家對地方交叉組合，與他者相較則相形見绌。前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倪孝銓即曾論述中國對俄屬遠東的政策，其指出中國政府雖未全然忽略遠東區，但對莫斯科的關注仍甚於前者，此乃中國與遠東區關係的發展未及

註⑭ 溫特曾謂世界政治理論研究存在三個分析層次：宏觀層次、互動層次與微觀層次，層次間的宏觀與微觀是相對的，不同層次的理論所欲解釋的對象也自然不同。不同層次結構間呈現一種非因果、非還原的關係，此即所謂的依附狀態。本文此處的論點則得自溫特對結構、施動性與文化闡釋論述的啟發。參見 Alexander E.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39-190.

註⑮ 中國外交學院副院長秦亞青教授認為，溫特的建構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身分政治理論。其因在於溫特以為體系結構不僅影響行為體的行為，也塑造行為體的身分；溫特進而認為體系結構對行為體身分與利益的建構，為其建構主義理論的最大貢獻，因為身分決定利益、利益決定行為。詳見秦亞青，「譯者前言」，秦亞青譯，〔美〕亞歷山大·溫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7。

註⑯ 作者曾於2009年9月前往遠東區，並沿俄中邊界實地訪察，途經濱海邊疆區首府－海參崴（音譯為：符拉吉沃斯托克）、遠東區最大中國市集所在地和中國人匯集最多之烏蘇里斯克（中文名雙城子）、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暨遠東區首府－哈巴羅夫斯克，以及阿穆爾州首府－布拉格維申斯克等邊界大城。

註⑰ 此處未將中國此一能動者比照俄羅斯再作區分之故，在於中國官方並不反對其人民向外發展，而中國民眾也正如俄國遠東民族所長拉林所言，為了經濟利益而不斷於邊界往返貿易。因此，中國無論在官方或民間，彼此樂見與俄國貿易的態度是一致的；況且中國官方與民間的態度一致與否，亦非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復萌的癥結。中國官方對邊境貿易的積極態度，可參見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頁117。

註⑱ 俄中兩國民眾的接觸互動可參見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頁127-129裡的分析說明，此處不再贅述。

中俄關係之故。^⑩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副所長波爾加可夫 (Vladimir Portyakov) 亦曾闡明俄國當局的態度：^⑪

1994 年起，俄國當局開始對境內來自中國尋求工作的移民加以控管，故並無所謂的失控現象…克里姆林宮 (Moscow Kremlin) 對此以鞏固俄中關係為優先而低調以對，並避免傳媒渲染，且一再重申將尋求雙邊皆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若從地方角度觀之，由表 1 則能了解遠東區區域身分變數在俄中關係的影響為何。除兩國彼此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為敵」具有一定的效應外，遠東區當地民眾亦明瞭國際關係仍得回歸國家層面，因而在與中國未來的關係發展此等重大議題，仍將遠東區置於聯邦框架下，所以在「遠東區與中國的關係」和「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兩組問題看法的比例幾近相同。

表 1 遠東區民眾對遠東區、俄羅斯與中國未來關係的看法 (2009 年)

	樂觀	悲觀	難以回答
您認為遠東區與中國的關係未來會如何？	57.5%	17.5%	25%
您認為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未來會如何？	57.5%	20%	22.5%

資料來源：作者 2009 年 9 月於符拉吉沃斯托克 (Vladivostok) (以下簡稱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 (Khabarovsk) (以下簡稱伯力)、布拉格維申斯克 (Blagoveshchensk) (以下簡稱海蘭泡) 與烏蘇里斯克 (Ussuriysk) 的訪察。^⑫

是故，跨國的國家對地方交叉組合在雙方皆側重國對國的交往下，因而落後於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難起真正的主導作用。此亦黃禍論的復萌何以肇因於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兩組觀念結構交錯互動之故。

國家對國際社會的態度與行為係以國家身分為基礎，不同身分的國家有不同的觀

註 ⑩ Ni Xiaquan,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 and Policies towar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Judith Thornton and Charles E. Ziegler eds.,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 (Seattle, Wash.: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 382.

註 ⑪ Владимир Портыков, (波爾加可夫) "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在俄羅斯的新中國移民：匯總)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3 (2004), с. 41, 46.

註 ⑫ 調查數據係作者於 2009 年 9 月間至遠東區，沿俄中陸地邊界以不記名的滾雪球抽樣方式取得，問卷份數共 80 份。必須說明的是，俄國目前所有與本研究議題相關的調查統計，泰半皆面臨樣本數與代表性足夠與否的嚴苛考驗，而僅能勾勒粗略樣貌，因為欲於幅員遼闊的遠東區進行全面的統計調查本即不可能之事。作者在人力、物力極其有限的情況下，也面臨相同困境。為克服此一限制，作者採取問卷內容部分延續俄國相關調查既有的提問，部分則穿插研究所需了解的面向。由於俄國相關研究機構會持續不定期以類似或相同的問卷進行調查，以觀察俄人的中國觀感；問卷部分採用俄方既有的提問，而與俄方調查相互對照的作法，除能藉以了解議題的動態發展，以及反向檢驗俄方既有的調查研究屬實與否外，亦能檢視作者調查的準確度。倘若同樣的問題所得數據相近，則代表所採得的趨勢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調查樣本數或許無法和俄方動輒數百份相比，但換算對應至遠東區內各聯邦主體的樣本比例亦相去不遠，仍可收對照參考之效。此次採得的趨勢多數亦與俄國學界既有的調查相近，故有一定的參考和補充價值，可強化訪談所得的觀察，並分析未來趨勢與可能發展。

念與對應的政策；一國的國家身分若產生有意義的變化，其國際社會觀與政策亦將對應轉變。^②因此，國家的身分決定其利益，而利益又決定其行為，亦即身分、利益與行為係連貫於同一軸線之上。本文後續將解構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此致使黃禍論復萌之雙重觀念結構內部身分與利益的聯繫。此外，由於黃禍恐懼係俄國的主觀認知，今日僅有「黃禍論」的存在，而無「白禍論」的渲染，故解構俄中關係時將側重俄羅斯於其間的身分、利益解讀。

參、俄羅斯於俄中關係的身分、利益解構

連結環境與利益的身分變數，除由國家自我與他者所建構的角色身分（role identity）外，國家的類屬身分（type identity）－自身特質亦為其間不可或缺者，此即內生固有身分。^③以下將就俄羅斯於俄中關係的角色身分及其類屬身分，解構俄羅斯於其間的身分與利益。

一、承受舊遺緒的新身分

俄羅斯獨立後自許為民主俄羅斯（democratic Russia），^④以有別於蘇聯（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的國家身分重生，但昔日超級大國的身分與內部不同思潮流派的世界觀遺緒卻仍續存，並轉化為新身分的泉源。

在冷戰後國際體系將如何變化尚無人知時，俄羅斯即已表明 21 世紀的國際秩序既非美國霸權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亦非任何版本的單極或兩極體系。美國並無單獨治理的能力，而俄羅斯儘管處於轉型困難時期，卻仍在科技、資源與軍備上保持固

註②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2.

註③ 溫特為標誌國際體系內的能動者－國家於其間的身分轉化，曾進一步將國家身分再區分為類屬身分、角色身分與集體身分。國家身分自是帶有物質基礎的團體身分（corporate identity），亦為上述分類的基礎。其中，類屬身分的身分內容來自較正式或較非正式的成員規則，這些規則因文化和歷史而異。它們定義何者為類屬身分，並引導他者對該類屬採取行動。在國際體系裡，類屬身分的對應為政權類型或國家形式，它們可能是由國家內部的政治合法性原則所建構，亦可能由一國與他國互動而產生。角色身分有賴於行為者在社會結構內據有定位，並以符合行為規範的方式同具有反向身分的他者互動後方能獲得。角色身分依賴共有期望，係自我通過他者所見的自我；其並非內在屬性，而僅存在於和他者的關係裡。集體身分則是將自我與他我的關係導向認同（identification），在此一認知過程裡自我與他我的界線將變得模糊，並使自我併入他我，從而使行為體將他者的利益定義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參見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24-227.

註④ 俄羅斯獨立後，首任外長科濟列夫（Andrei Kozyrev）曾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敦促俄美戰略夥伴關係，其提及美國與民主西方雖是極權蘇聯的敵人，卻是民主俄羅斯的天然友人和最終盟友。參見 Andrei Kozyrev, "The Lagging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 73, Iss. 3 (May/June 1994), p. 59.

有的大國特徵。^⑤因此，俄羅斯仍視自己為國際上不可或缺的超級大國，並尋求與美國在多極世界裡的夥伴關係。隨著俄羅斯發覺其影響力不若以往，而且必須犧牲許多傳統利益以換取西方的援助後，這樣的信念又更加堅定，也為俄中兩國日後在反霸與世界格局多極化的角色身分匯合理下伏筆。

就內生固有的類屬身分而言，追求國家利益向來為國家不變的終極目標，但國家利益為何，則隨國家身分定位而異，此可見證於當代俄國國際關係各流派在政策主導地位的競逐。俄羅斯下新城語言大學（Nizhni Novgorod Linguistic University）國際關係暨政治科學系教授謝爾古寧（Alexander Sergunin）曾指出，由於西方在巴爾幹（Balkans）與他處的干涉，使得現實主義（Realism）今日在國家利益、外交政策、國內改革與安全防護等若干原則上一統各派，但理想主義（Idealism）、全球主義（Globalism）與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卻仍舊存在，並提供不同的主導範式（dominant paradigm）選項。^⑥然而，個人認為當前的一致性僅是暫時表象，而所謂的理想主義、全球主義或後實證主義亦為自外借鑒者，俄國原生的東西路線之爭今日則是暫時蟄伏，他日仍將再起並主導俄羅斯的國家身分認知。一如俄羅斯科學院美國與加拿大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 USA and Canadian Studies）研究員沙克列伊娜（Tatyana Shakleyina）與科學院世界經濟暨國際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主任研究員博加圖諾夫（Aleksei Bogaturov）所言，現實主義在俄國亦有分歧，而爭論的正是新俄羅斯的自我身分認同，其立論基礎仍不脫俄國獨特的地理疆域、文明使命、強國歷史傳統或國家內部需求與政治價值的反映。^⑦

知名俄國史家克流切夫斯基（Vasily Klyuchevsky）即指出，俄羅斯在歷史上當然不像亞洲，但在地理上也不全然像歐洲。俄國是個過渡國家，是兩個世界的中介。俄國的文化使它與歐洲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但自然界賦予它的特徵和影響，卻常帶領它前往亞洲，或給予它亞洲的事物。^⑧此一歐亞文明雙重性無形間已成為俄國文明的遺緒，並且不時影響國家走向。俄國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尋求融入西方以來，即自我定位為西方國家，但由於帝俄對外擴張與西歐對泛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的疑懼，讓俄國始終難以被西歐真正接納。在西歐人眼裡，俄國往往僅是半開化的「亞洲」國家，只有輕薄的「西化」外表勉強掩飾沙皇獨裁的東方淵源；再者，西歐亦畏懼俄國帝國主義裡的亞洲成分，而將俄國與黃禍連結。俄國既然難以被西方接納，故每逢受挫便轉向東方尋求平衡。

俄羅斯獨立後尋求融入西方大家庭，此一自我定位－「西方國家」自是內部共

註⑤ Kozyrev, "The Lagging Partnership," p. 63.

註⑥ Alexander A. Sergunin, "Discus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st-Communism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7, Iss. 1 (March 2004), p. 32.

註⑦ Tatyana A. Shakleyina, Aleksei D. Bogaturov, "The Russian Realis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7, Iss. 1 (March 2004), pp. 48-50.

註⑧ Василий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克流切夫斯基)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часть I* (俄國史教程－第一卷)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7), с. 65.

識，但國內對此依舊爭論不已，^②故俄羅斯的國家身分仍與外在國際環境持續互動建構，表徵於外即為當代的外交實踐：由向西方一面倒，轉為東西平衡，最後再變為全方位外交，其間的重要環節—俄中關係自亦連帶調整。

二、身分、利益的變與不變

（一）角色身分的解構

俄羅斯在帝俄與蘇聯時期同中國的互動，深受自身尋找地緣政治緩衝區與出海口的的外交傳統影響。囿於地緣政治思維，使得俄國昔日向來以西方為優先，東方的序位不僅次於西方，甚至還落在南方之後。復以其邊疆地區與鄰國的可滲透性有礙國家安全，致使統治者不斷向外擴張以排除被鄰國滲透的可能。對外擴張和避免已占有領土的得而復失，便成為俄國外交的首要。冷戰後，自許為西方國家與超級大國的俄羅斯，在外交上起初亦以西方為主，但在身分不被見容後，俄羅斯也逐漸意識到其面臨的一超多強國際格局，為前所未見的世界新秩序，東方的中國亦今非昔比，俄羅斯因而改弦易轍，逐漸自我調整為歐亞國家。在國家身分定位轉變下，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自然隨身分而異，其對外政策亦對應轉變。

不再一味以西方為主後，俄羅斯轉而儘可能兼顧東方，並開始重視自身於亞洲的存在。如 1990 年代中期俄羅斯對外政策轉折之際，已故前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Philosophy）資深研究員齊姆布爾斯基（Vadim Tsymbourskiy）、博加圖諾夫與拉林^③等人對西伯利亞（Siberia）與遠東區未來的討論，即遠超過對美國在國際體

註 ② 俄羅斯甫獨立時，國內就外交方針走向的討論，即屬國家身分層次的探討。當時俄羅斯急需一份官方文件，說明國家的外交立場，在 1993 年 4 月「俄羅斯對外政策概念」簽署頒布前，俄國各界對此激辯不已。1992 年 7 月，當時的外長科濟列夫成立了一個諮詢團體——「外交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Policy），以回應眾人對其政策的批評，並意圖藉此尋求政界和學界的支持。經過兩回討論後，同年 11 月完成一份新草案，並於翌年 1 月修訂完成。由「外交委員會」與「安全會議」（Security Council）同時呈送國會，並於 1993 年 4 月由當時的總統葉爾欽批准。在草案討論過程裡可以發現兩個變化：其一，對於「近鄰」（near aboard）的關注愈來愈多；其二，與西方友好雖然仍是外交優先，但蜜月期已告終結。期間，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亦於 1992 年 8 月 19 日的獨立報（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發表「俄羅斯的戰略」（Strategy for Russia）一文，並認為其所信奉的觀點應成為俄羅斯外交的考量重點，而希望藉以影響官方草案的制定。在「俄羅斯外交政策概念」與「俄羅斯的戰略」裡處處可見大西洋學派、歐亞學派和大俄羅斯帝國主義學派三派的意見，兩者都關切同樣的問題，雖然著重之處不盡相同，但彼此都較偏向歐亞學派的中間路線。關於「俄羅斯外交政策概念」的討論可參見“Дискуссия о том, какой быть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關於俄羅斯對外交政策走向的討論）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國際現勢）（февраль 1993），с. 6-21；「俄羅斯的戰略」可參見“Стратегия для России,”（俄羅斯的戰略）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獨立報），19 августа, 1992, с. 4-5。

註 ③ 此處經作者確認後發現可能是刊物印刷錯誤，將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遠東民族研究所所長維克托·拉林誤植為 P. L. Larin。沙克列伊娜與博加圖諾夫所引文獻出處則為 Виктор Ларин,（拉林）“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кто же будет отстаивать наш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 Взгляд с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世紀之交的俄羅斯與中國：由誰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俄屬遠東的觀點）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遠東問題），No. 1（1997），с. 15-26。

系單極效應的關切，其目的即在於防止遠東區成為中國地緣經濟與文化影響的一部分。^①時至今日，視遠東區和西伯利亞的開發為國家未來命脈所在已成共識，相關領導人更曾多次宣示要積極開發東方，正視俄羅斯的亞洲利益，俄中關係的位階因而連動提升。

俄羅斯今日的遠東政策雖有一定程度的延續性－平衡在西方的挫敗，^②但由於俄羅斯一路跌撞後已自我調整為歐亞國家，復以和中國在反霸、多極化倡議上身分立場的有志一同，兩國此時的戰略匯合已不全然僅是物質利益面向的考量，雙方關係一路翻升，之後更定調為「世代友好，永不為敵」。兩國冷戰後的互動不僅正向建構，亦兼具限制性（regulative）效果^③。此後宣示的「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無疑可作為兩國的共有知識（shared knowledge），亦可詮釋為兩國所期望的共有文化。倘若歐亞國家係俄羅斯基於內在屬性而內生的類屬身分，作為「中國的戰略夥伴」則是俄羅斯在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裡的角色身分。該角色係從屬於俄中互動關係下的結構特徵，亦為俄羅斯通過與他者－中國再現所建構，但並非能動者－俄羅斯自身的特徵。^④

俄羅斯為建立與再造自身於俄中關係的主體定位（subject position），必然得將角色內化，從而達到兩國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為敵」下的身分。^⑤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前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李靜杰即指出，兩國為增進彼此人民的理解，鞏固、擴大戰略夥伴關係的社會基礎，而有後續「國家年」的推行。^⑥中國黑龍江省社科院俄羅斯研究所所長宿豐林亦指出，不容否認兩國關係憑倚兩隻巨輪前進，政治之輪現下駛得相當好，經濟之輪卻仍然脆弱。然而，文化交流卻是雙邊關係發展的決定因素，文化交流的貧瘠使得戰略夥伴關係進展緩慢，相互了解的缺乏更是

註① Shakleyina, Bogaturov, "The Russian Realis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7.

註② 派普斯（Richard Pipes）即指出，俄羅斯和歐洲、東亞、中東及北美都有邊界接鄰，以史為鑑可知，俄國在其他邊界遭遇困難時，便會移轉注意力至他處以平衡先前的挫敗。葉爾欽也才會宣布：「為因應西方聯盟的擴張計畫，他的政府已將規畫整合加入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和加強與中國的夥伴關係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參見 Richard Pipes, "Is Russia Still an Enemy?" *Foreign Affairs*, Vol. 76, Iss. 5 (September / October 1997), p. 76.

註③ 溫特曾指出，規範係於特定身分下對適當行為的集體性期望；規範在界定身分意義時具構成性效果，在規定相關行為標準時則具限制性效果。參見 Alexander Wendt,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01~108.

註④ 共有觀念使持有這些觀念的行為體具有所謂的主體定位格局。主體定位係由自我與他者的再現所建構，此種再現是對自我與他者作為以某種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特殊類型能動者的再現，其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與再造條件。體系的再造只有當真實的人們填補某類角色時才可能發生。但由於不同的人們在不同的時間可以占據同樣的位置，並能以不同的方式實現角色目的，因此角色並不能還原至個人。是故，角色是結構特徵，而非能動者特徵。參見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57.

註⑤ 溫特曾就角色與角色身分作一釐清，其指出角色是結構位置，並非行為者的信念，係客觀、集體建構的位置，只要有人持續填充就會繼續存在。角色身分則是主觀的自我解讀，隨著個人獲得或放棄信念而存在或消失，而角色又能使角色身分的解讀具有意義。參見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58~259.

註⑥ 李靜杰，「跨入新世紀的中俄關係」，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北京），2007年第2期，頁56。

兩國過往衝突乃至於戰爭的主因。^⑳「國家年」既有助於彼此廣泛的文化交流，亦能消弭「中國威脅」的非理性恐懼。尋找減緩此一恐懼與避免此危及雙邊關係的方法已是當務之急，而「國家年」的意義即在於此。^㉑2007年，時任第一副總理的梅德韋傑夫（Dmitrii Medvedev）在俄羅斯「中國年」落幕前夕更表示，俄中兩國共舉辦五百多個大型活動，在兩年間共有上萬的兩國公民直接參與，而透過媒體間接參與者更達數億之多。在兩國關係史上任一時期、在多個層次上從未有如此緊密的聯繫。「國家年」正是加強俄中夥伴關係與發展進一步合作的堅實基礎。^㉒

「國家年」、「語言年」以及後續於2012年啟動的「旅遊年」，^㉓證明俄中兩國正將彼此的共享理念付諸實踐，邁向彼此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為敵」、「國家年」、「語言年」更是近年雙方政策宣示與學界論述不時提及的理念標竿。宏觀結果憑藉微觀層次的多重形式而得以實現，有別於軍事交流與經貿合作的龐大物質利益，近年極具開創性且已告一段落之側重文化面與肩負界定身分意義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國家年」和「語言年」，無疑可作為檢視俄羅斯於俄中關係身分建構與互動成效的代表性指標。

1. 俄人對公共外交的觀感

個人走訪遠東區時，曾探訪當地民眾對兩國公共外交的觀感，有趣的是多數俄人雖然知道「中國年」，但卻是在思索許久後才想起似有此事。儘管有人表示知曉與見過

註 ㉑ 1953年至1957年間是蘇中共在意識形態與政治最相近的時期，但自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Joseph Stalin）後，雙邊的裂痕即逐漸浮現。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主政期間是蘇中共關係的轉捩階段，後續衝突的激化亦為此一時期的延續。蘇中共的分裂雖常被歸咎於「去史達林化」（De-Stalinization）所致，但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以引進中國工人為例，赫魯雪夫原以為是皆大歡喜的提議，因為既能幫助中國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又能協助西伯利亞的開發，但卻被毛澤東反駁為傷害中國民族自尊之舉。赫魯雪夫原欲作罷，但中國之後卻又不斷表示願提供兄弟般的協助。赫魯雪夫於其回憶錄便表示當時為免橫生枝節，故與中國簽訂初期引進20萬名中國工人的勞動合同。訪華期間，赫魯雪夫在聆聽毛澤東暢談中華民族的優越，宣示中國人頑強不屈並能同化所有征服者的歷史課後，赫魯雪夫反而認為蘇中關係發展未來必然遭遇困難，原因在於毛澤東滿腦子民族主義思想，而同化之說更強化赫魯雪夫日後認定毛澤東意圖讓蘇聯引進中國工人，從而兵不血刃地占領西伯利亞，滲透並接管當地的經濟，進而同化當地俄人與住民，和平占領俄國領土的想法。有關引進中國工人的爭議可參見 N.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by Strobe Talbott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pp. 249-250, 283；述弢、王尊賢、袁堅、范國恩、郭家申等譯，尼基塔·謝·赫魯雪夫著，*赫魯雪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257-2259、2262。至於歷史疆界的爭議，蘇中雙方更是各說各話，難有共識。因此，宿豐林所言的相互了解缺乏，或許也可以說是彼此過於了解而難有交集，反倒使得誤解進一步加深。

註 ㉒ Su Fenglin, "Questions Regarding Past and Present Sino-Russian Cultural Exchange," in Iwashita Akihiro ed., *Eager Eyes Fixed on Eurasi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07), pp. 105, 107.

註 ㉓ 「梅德韋傑夫：兩個國家年的舉辦擴大了兩國的合作」，*俄羅斯新聞網*，2007年11月5日，http://big5.rusnews.cn/ezhongguanxi/ezhong_zhengzhi/20071105/41950444.html。

註 ㉔ 俄中兩國自2006年起輪流在自己國家境內舉辦以對方為主題的公共外交活動，首先是2006年的中國「俄羅斯年」與2007年的俄羅斯「中國年」，之後又有2009年的中國「俄語年」與2010年的俄羅斯「漢語年」，2012年啟動的則是中國「俄羅斯旅遊年」與翌年2013年的俄羅斯「中國旅遊年」。

相關活動，卻有更多的人透露未在遠東區見過此類活動的舉辦，有人甚至還戲謔地表示這可能只存在於莫斯科和北京兩地，而相似的反應亦見於當地的中國移民客工。個人亦試圖藉由遠東區民眾對中央政策的評價，反向了解莫斯科內化戰略夥伴角色的成效為何，所探得的趨勢顯示：「國家年」似未發揮改變身分與利益的建構作用，因為近八成的俄人雖然知道「中國年」，也肯定此有助於了解中國，但同樣也有近七成的人表示不會因此對中國改觀。(參見表 2) 此外，近七成的民眾也不知翌年 (2010 年)「漢語年」舉辦在即。^④類似情況亦見於中國，儘管有近七成的中國民眾因為「俄羅斯年」而對俄國有更多的了解，但對俄國觀感的改善卻僅有 9.7%。^⑤

表 2 俄人對「中國年」的觀感 (2009 年)

您知道俄國在 2007 年舉辦「中國年」活動嗎？	知道	不知道	
	77.5%	22.5%	
「中國年」活動有助於您了解中國嗎？	有	沒有	難以回答
	70%	10%	20%
「中國年」活動會讓您對中國人改觀嗎？	會	不會	難以回答
	20%	67.5%	12.5%

資料來源：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與烏蘇里斯克的訪察。

「中國年」未能完全發揮作用與俄人對此印象不深，或許與「中國年」主要針對年輕族群而相對忽略其他年齡層有關，不然即為宣傳不足或俄人平日為生活奔波而無暇顧及。遠東民族所中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資深研究員列雅柏切科 (Nikolai Riabchenko) 對此則認為，「中國年」與「俄羅斯年」是很好的活動，但因其屬於高階政治 (high politics) 範疇，故才未廣為人知，也未能讓民眾深入了解活動的用意，而泰半僅見於傳媒宣傳。^⑥

2. 公共外交對俄人的中國觀感影響

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 (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⑦於 2009 年 6 月

註 ④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與烏蘇里斯克的訪察。

註 ⑤ 您從中國的「俄羅斯年」活動中是否有所收穫？(2006 年)

對俄羅斯有更多新的了解	68.2%
對俄羅斯的觀感改善	9.7%
從活動中獲利	1.3%
沒有任何收穫	8.3%
對俄羅斯的觀感變差	6%
不知何謂「俄羅斯年」	6.5%

資料來源：整理自「您從中國的『俄羅斯年』活動中是否有所收穫？」，俄羅斯新聞網，2006 年 11 月 8 日 (20:43)，http://rusnews.cn/vote/index_13.html。

註 ⑥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遠東民族所的訪談。

註 ⑦ 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的中譯以俄文原文為主，英譯則按該研究中心網站所提供者，原因在於其英譯與俄文原文有些許出入，如該中心之俄文原名為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即為全俄羅斯之意，但英譯卻未見 All-Russian 字眼。

17 日公布的第 1247 號調查－「鄰居，夥伴，競爭者？俄羅斯人論中國」(Сосед, Партнер, Конкурент? Россияне о Китае)，^⑤為 2005 年、2007 年與 2009 年三次調查的綜整，我們從中可探知俄人的中國觀感於「國家年」舉辦期間的變化。

就「在過去十年對中國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的提問而言，2005 年至 2007 年變化的幅度甚於 2007 年至 2009 年者。值得注意的是：正值 2007 年俄羅斯舉辦「中國年」之際，俄人對中國看法「變得更好」的卻下降 6%，「變得更壞」的也下降 4%，但「不變」與「我對中國不感興趣」的部分也各自提升 7%與 4%。顯見「中國年」舉辦的當下，雖讓俄人對中國看法變壞的比例下降，但讓俄人態度趨於保留的作用卻又更甚。(參見表 3)

若就 2009 年與 2007 年的數據相較，在「國家年」系列活動結束後，俄人對中國不感興趣的比例明顯下降 5%，對中國看法不變的則下降 2%，顯示「中國年」至少引起俄國民眾的注意，雖然看法變好與變壞的部分也各自提升 2%。(參見表 3)

表 3 您在過去十年對中國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若有，是朝那方面？(2005 年、2007 年、2009 年)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變得更好	28%	22%	24%
不變	38%	45%	43%
變得更壞	12%	8%	10%
我對中國不感興趣	16%	20%	15%
難以回答	6%	5%	8%

資料來源：摘自“Сосед, Партнер, Конкурент? Россияне о Китае,” (鄰居，夥伴，競爭者？俄羅斯人論中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1247 (16 июня 2009), <http://wciom.ru/index.php?id=268&uid=12005>.

相較於對中國觀感變化的平緩，俄人對兩國關係未來走向的評價，在「國家年」落幕後則明顯提升。最顯著的是，認為中國是俄羅斯戰略和經濟夥伴的比例，一路從 2005 年的 34%攀升至 2009 年的 41%。此外，認為中國是友好國家和盟友的比例，雖從 2007 年的 27%驟跌至 2009 年的 19%，但認為中國是戰略和經濟夥伴的比例也上升了 5%。由於「友好國家，盟友」與「戰略和經濟夥伴」皆屬正向類別，故其間的此消彼長尚難謂俄人否定中國。其次，「友好國家，盟友」與「戰略和經濟夥伴」的比例總和，雖由 2007 年的 63%下跌至 2009 年的 60%，其間的 3%則轉移至「經濟和政治敵人，競爭者」類別，但 3%仍在統計誤差範圍內，也尚不足以解釋為「中國年」惡化俄人的中國觀感。(參見表 4)

註⑤ “Сосед, Партнер, Конкурент? Россияне о Китае,” (鄰居，夥伴，競爭者？俄羅斯人論中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1247 (16 июня 2009), <http://wciom.ru/index.php?id=268&uid=12005>. 是項調查於 2009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在俄羅斯聯邦 42 個州、邊區與共和國的 144 個社區裡，針對 1,600 名居民隨機抽樣訪談而得，統計誤差不超過 3.4%。

表4 您認為今日中國對俄羅斯而言？（2005年、2007年、2009年）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友好國家，盟友	22%	27%	19%
戰略和經濟夥伴	34%	36%	41%
經濟和政治敵人，競爭者	24%	21%	24%
敵對國家，潛在對手	4%	4%	4%
難以回答	16%	13%	13%

資料來源：摘自“Сосед, Партнер, Конкурент? Россияне о Китае,”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1247 (16 июня 2009), <http://wciom.ru/index.php?id=268&uid=12005>.

必須說明的是，俄中關係與俄人的中國觀感在俄羅斯雖然是長年被關切的議題，相關研究機構也常就此不定期地追蹤調查，但既為不定期，即代表調查並未逐年實施。此或許與民眾的看法除非有突發重大事件，否則短期間不致於有大幅度的變化有關，因此也無須密集地逐年追蹤。受限於此，我們仍無法全面地了解俄羅斯「漢語年」的成效，但遠東民族所於2010年中在遠東區進行的調查仍可供我們參考。

由遠東民族所的調查可知，2010年時遠東區民眾仍有高達64%的比例，視中國為俄國東疆主要安全威脅，其中有37%認為威脅確實存在，27%則認為有點威脅性，但認為遠東區應優先與中國發展關係的比例卻高達53%，而且是所有合作對象裡排序最高者。此外，就遠東區應優先與中國發展關係的比例同樣逐年上升，由2003年的33%攀升至2008年的50%，再到2010年的53%。^④儘管真正視中國為安全威脅者僅有37%，但其間對中國拒之，抑或迎之的猶豫心態卻已表露無疑。是項調查雖尚不足以判斷「漢語年」在俄羅斯的成效，卻能讓我們了解兩國推行多時的公共外交，對遠東區民眾的中國觀感影響。

3. 公共外交對俄人的中國人觀感影響

從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亦可探知俄人對中國人的團體評價變化。其中，認為兩國人民關係一般且平穩者，從2005年至2009年皆維持在四成左右，雖未

註④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拉林) Лилия Ларина, (拉林娜)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ТР в зеркал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прос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г.),” (俄羅斯於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安全與合作的民意反映 (根據2010年遠東居民訪談的結果)) *Россия и АТР, (俄羅斯與亞太地區)*, No. 1 (2011), с. 55, 65-66. 是項調查於2010年夏季至秋季初，在遠東區針對790名居民進行訪談而得。據拉林與拉林娜表示，由於資金不足和訪談人員專業程度有待加強，故在海參崴較偏遠地區的調查結果可能有誤。此外，在海蘭泡與馬格丹州因樣本數不足，而薩哈林州的受訪者有三分之二為女性且近半數為學生，故僅能反映當地一定的氛圍，還稱不上是趨勢，未來仍需進一步的研究。至於遠東區應和誰優先發展關係的選擇，中國以53%居首，其後則為日本—52%，西伯利亞與遠東區—41%，歐俄地區—32%，南韓—28%，美國—18%，西歐—10%，澳洲—4%，北韓—4%。參見 Ларин, Лари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ТР в зеркал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прос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г.),” с. 65.

過半卻已是多數，其他項目雖有些微波動，但卻相差無幾。^④（參見表 5）因此，「中國年」對俄人就兩國人民關係的看法並無顯著的影響。

表 5 您如何評價當前俄中兩國人民的整體關係？（2005 年、2007 年、2009 年）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友善的	15%	19%	17%
好的，睦鄰的	19%	17%	17%
一般，平穩的	40%	40%	39%
冷淡的	11%	10%	10%
緊張的	3%	3%	5%
仇視的	2%	1%	1%
難以回答	10%	10%	11%

資料來源：摘自“Сосед, Партнер, Конкурент? Россияне о Китае,”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1247 (16 июня 2009), <http://wciom.ru/index.php?id=268&uid=12005>.

個人亦曾將中國人抽離作為變數，設計不同的問題，以探知公共外交是否有助於遠東區俄人了解中國人，所探得的趨勢顯示：當地民眾雖未排斥非中國人的外來族群，但中國人在遠東區確實相對不受歡迎；再輔以調查所得資料則能得知，約略有三分之一的俄人認為中國人的到來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糟。（參見表 6）此外，在遠東區的中國移民客工同樣也不喜歡俄人，顯見兩國民眾間的隔閡仍有待化解。

表 6 遠東區民眾就中國人與其他外國族群對當地影響的觀感（2009 年）

	變糟	變好	沒影響	難以回答
您認為中國人在當地對您的生活有何影響？	32.5%	10%	35%	22.5%
您認為外國人（不包括中國人）在當地對您的生活有何影響？	10%	22.5%	40%	27.5%

資料來源：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與烏蘇里斯克的訪察。

在遠東民族所就俄人對中國人感到優越或排斥的團體評價調查裡，遠東區民眾近年對中國人的態度亦無太大轉變（參見表 7）。如 2003 年時當地民眾自認較中國人優越的比例為 29%，2008 年時仍有 28%；對中國人感到排斥的比例在 2003 年為 34%，2008 年為 29%。是項調查 2008 年的不同對照組裡，遠東區民眾對朝鮮人感到優越與排斥的比例各為 14%與 10%，對日本人則為 9%與 6%。兩相對照下，中國人在遠東區無疑相較於其他東亞族群不受俄人歡迎。

註④ “Сосед, Партнер, Конкурент? Россияне о Китае,”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1247 (16 июня 2009), <http://wciom.ru/index.php?id=268&uid=12005>.

表 7 遠東人對與中國人往來的觀感 (2003 年、2008 年)

	優越	未想過	無		排斥	未想過	無
2003年	29%	32%	38%		34%	39%	26%
2008年	28%	34%	38%		29%	28%	43%

資料來源：綜 整 自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拉林) Лилия Ларина (拉林娜),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населения, 2008 г.),” (遠東人觀點的周邊世界 (根據 2008 年居民訪談的結果)) *Россия и АТР* (俄羅斯與亞太地區), No.1 (2009), cc. 40~41.

儘管受訪者對中國人感到優越與排斥的比例各約三分之一，但拉林與遠東民族所資深研究員拉林娜 (Liliya Larina) 卻特地指出，因內在羞愧感所致，縱然為匿名問卷，許多俄人的態度泰半仍是閃躲或隱藏真意。俄人對中國人、朝鮮人與日本人三個民族的態度，取決於對方行為的有 27%，取決於外表的有 11%，取決於言語的有 7%，而依自己直覺判斷的則是 19%。其間，俄中邊境中國人的舉止、外貌以及和俄人的接觸互動，便成為遠東區民眾的中國印象基礎之一，而另一根深蒂固的黃禍恐懼也在無形間助長俄人對中國人的排斥。^④至於拉林與拉林娜因俄人內在羞愧感所導致的可能誤差而秉持的保留態度，無形間也承認俄人對中國人嚴重的優越與排斥傾向。

俄中邊境貿易雖然互補，但個人發現遠東區的市場結構卻極為扭曲：俄人泰半因收入有限而不得不購買中國商品，中國人則為了生計而必須忍受許多不便或被變相勒索，彼此抱怨對方連連，卻又不願讓對方知悉。所以，物質需求並無助於身分調和，反倒因為身分隔閡又鞏固既有偏見。^⑤儘管前俄羅斯駐中國大使、知名漢學家羅高壽 (Igor Rogachev) 指出，俄中兩國年輕一輩的加強接觸將是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關鍵，俄中關係的長遠發展與穩定有賴於年輕的下一代，^⑥但既然寄希望於未來的「國家

註 ④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拉林) Лилия Ларина (拉林娜),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населения, 2008 г.),” (遠東人觀點的周邊世界 (根據 2008 年居民訪談的結果)) *Россия и АТР* (俄羅斯與亞太地區), No.1 (2009), cc. 40~41. 是項調查於 2008 年春季至夏季間在遠東區南部針對 815 名居民進行訪談而得。另根據拉林與拉林娜表示，在比羅比贊的樣本數由於過少，故僅能視為當地居民的態度傾向。

註 ⑤ 若干俄國民眾雖表示喜愛中國文化，也樂於和中國人往來，但多數俄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其實不佳，幾近將華商與勢利或狡猾劃上等號。有些受雇於中國人在商場市集工作的俄人，也不喜歡和中國人合作，認為華商喜歡玩弄手段，凸顯自己的威嚴或以績效計薪。俄人會有這樣的認知，極可能忽略商人在商言商的本質。俄人多半也認為中國人粗鄙，厭惡其喧嘩與隨地吐痰的陋習，對於中國人認為當地過去屬於中國的看法更是不以為然。但對在遠東區的中國人而言，俄人卻也幾近與懶惰、散漫和毫無時間概念劃上等號，中國人對當地貪污和勒索成習更是痛恨不已。但據當地中國人告知，勒索現象自 2006 年、2007 年的大掃蕩後已逐漸變少，此可能與目前在遠東區的中國人身分多半合法而無從勒索有關。中國人為人身安全考量也僅出現於商場市集，平日或夜間更是足不出戶以免無端惹上麻煩。此外，和俄人認為中國商品質劣僅相對便宜，是沒有更好的選擇才購買的看法，中國人則認為中國商品價廉物美，此又為彼此認知落差一例。中國人在遠東區多半在商言商，因其認為與俄人交心不易，表示有些俄人雖然對中國人友善，當中國人是朋友，但畢竟仍屬少數。中國人和俄人雖然避談歷史問題，但在心理情感上卻仍認定遠東區屬於中國。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與烏蘇里斯克的訪談。

註 ⑥ Su Fenglin, “Questions Regarding Past and Present Sino-Russian Cultural Exchange,” p. 108.

年」成效有限，兩國藉以落實彼此理念的公共外交，之後顯然可再擴大至不同年齡層的民眾。

從俄中兩國自 2006 年起輪流於境內推動以對方為主題的公共外交活動可知，公共外交目前至少已發揮協調、規範彼此行為的限制性效果，而戰略夥伴關係亦已內化至角色身分階段，有著彼此期望的共有文化。儘管如此，兩國離含括對方而相互融合的集體身分（collective identity）階段仍有相當的差距，因為隔閡也確實存在。兩國在國際間的互為表裡縱非全是利益匯合，卻也未及自我併入他我的程度。雙方雖正向建構出「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共有文化，但其間僅達簡單習得（simple learning）程度，尚無足以完全改變身分與利益的複雜習得（complex learning）效應。^{⑤①}

另一方面，從俄人對公共外交的觀感，以及公共外交對俄人就中國與中國人觀感的影響可知，該系列側重文化面的活動在俄中兩國間雖是創舉，但在俄國境內由於寄希望於年輕一輩而顯得成效有限，在遠東區當地雖讓俄人對中國人的排斥感略降，卻仍舊未能扭轉俄人的優越心態。^{⑤②}再者，由公共外交成效與俄人對中國人歷年觀感的對照，則能得知俄人對中國人觀感微觀層次的再現，實已超越臨界點而達到更高層次的集體再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⑤③}，亦即個別俄人對中國人的觀感，已跨越足以轉化為集體層次的門檻，並社會化於彼此互動，成為集體信念與期望。此亦中國人何以十餘年來依舊不為俄人所喜，而評價僅優於高加索人之故。

儘管隔閡仍在，但俄中兩國當前的公共外交對彼此形象的提升仍有一定作用。誠如拉林所言，幸虧兩國有非官方而自然發生的區域聯繫，如地方首長互訪、締結姐妹市、貿易投資、穿梭貿易（shuttle trade）等，其間固然喜憂參半，但也因此超越政經範疇而具備文化性質。雙方互信雖仍不足，如中國人長年被灌輸俄國等同於「北方威脅」，俄人亦持續感染「黃禍」症候群，但「國家年」對於形象的匡正卻有極大的正面價值，至少俄國傳媒被迫與官方同調，減少對中國以及在俄華人的負面報導。此能否持續尚不得而知，但至少仍在網路延續。^{⑤④}若非如此，正處於前所未有友好階段的俄中兩國，便未能正視彼此潛在的問題。

（二）類屬身分的解構

溫特論述其三種國際體系結構文化時，除指出國際體系文化影響體系成員外，亦指出體系文化同樣也受國內或跨國層次文化的影響。^{⑤⑤}循此邏輯，建構作用既是雙向，

註 ⑤① 簡單習得係視身分與能力為既定，僅強調習得對行為的因果作用；複雜習得則指在互動間產生改變彼此身分和利益的建構作用。參見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27.

註 ⑤② 劉蕭翔，「俄羅斯『中國年』的公共外交成效評估」，公共外交季刊（北京），總第 7 期（2011 年秋季號），頁 37-40。

註 ⑤③ 集體再現取決於微觀層次足夠的再現或行為頻率。關於宏觀集體再現與微觀角色身分間的轉化，可詳見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64-265.

註 ⑤④ Ларин,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опыт,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 40-41, 45, 47.

註 ⑤⑤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57.

無可諱言國內文化也必然影響跨國層次文化或體系文化。就俄國內生固有的類屬身分，亦即能動者的特徵，對俄中兩國期望的共有文化影響而言，我們仍能發現俄國文化屬性亦為阻礙兩國身分調和的障礙之一。中國復旦大學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趙華勝即曾指出，俄羅斯的文明根基為東正教文明，中國則為儒教文明。兩種文明間有種難以逾越的隔膜與陌生而不易交融。文明的不同未必導致衝突，卻會讓彼此難以親近，此一特點對兩國關係的影響既是無形，亦是深刻持久的。^{⑤6}

面臨前所未見的一超多強世界新格局，又感受到東方的不可忽略後，俄羅斯雖已自我調整為歐亞國家，但實質仍非亞洲國家。歐亞雖是一塊大陸，但所指的卻是兩大洲，也至少存在兩塊文明與經濟區，兩者本質的差異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只有在俄國，歐亞主義（Eurasianism）意識形態才具有潛在的統一象徵。但即便在歐洲，其間蘊含的歐洲認同也依舊分歧，各國泰半以自己的國家政治觀替代歐洲觀。如在波羅的海與中東歐，集體身分認同構成的核心之一即為「歐洲」；對當地而言，「歐洲」為「自我」，對應的可怕「他者」則為蘇聯或俄羅斯。^{⑤7}故對同處於歐洲的國家而言，其間的身分認同即難已調和；若從歐洲的角度看亞洲，自我與他者的區隔亦是涇渭分明。如前總統外交顧問、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主席團榮譽主席卡拉噶諾夫（Sergei Karaganov）便指出，亞洲並非單一實體，而是歐洲文化與政治思想的產物。歐洲人昔日即視亞洲為包含中東、波斯和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據稱曾抵達的印度部分；今日則至少有三個亞洲：中國與日本的神道儒家東亞、佛教印度，伊斯蘭中亞，以及為波斯後人的什葉派伊朗（Shiite Iran）與主要為遜尼派（Sunni）的阿拉伯世界中東。^{⑤8}

就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與地處東亞並久為亞洲大陸霸權的中國而言，兩者在因文化與歷史而異的類屬身分上自是不同。俄人東進之際，事實上也將三分之一的亞洲大陸，納入在文化上可劃歸歐洲的俄國，儘管俄國又未必被西歐承認為歐洲國家。對於自身的文明歸屬，俄國內部更存在不同流派的爭論，歐亞主義斯拉夫派（Slavophiles）甚至認為俄羅斯處於兩種文明間，與東西方皆不相同。^{⑤9}因此，俄中兩國的類屬身分若有分歧亦不令人意外。

卡拉噶諾夫甚至提出俄羅斯應作為「第三西方」的構想，表示俄羅斯若未能加速與「新西方」—東亞及南亞的經濟和解，未來將有永遠落後的風險。對面臨西邊的「第一西方」與東邊的「第二西方」包圍的俄羅斯而言，此既是挑戰亦是機遇，若能

註⑤6 趙華勝，「中俄關係的模式」，關貴河、樂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41~42。

註⑤7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76~77, 84.

註⑤8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卡拉噶諾夫) “Вперед в Азию?” (前進亞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俄羅斯報), 22 июля, 2008, с. 1.

註⑤9 Sergunin, “Discus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st-Communism Russia,” p. 23.

趁時而起則將能成為「第三西方」，此將遠甚於歐亞主義或第三羅馬。^⑩雖說如此，卡拉噶諾夫的論點實仍為過往第三羅馬思想的蛻變。在俄羅斯超脫他者的自恃下，其欲與他人發展出自我併入他我之集體身分恐怕仍是遙遙無期。

（三）身分、利益的變與不變

透過不同層次的身分反向解構，我們了解到：俄羅斯獨立後本以西方國家的身分自許，但在外部環境未如己意的情況下，又自我調整為歐亞國家以追求其認定的國家利益。俄羅斯的國家身分調整後，追求最大國家利益的信念雖仍不變，但其國家利益之所在已由西方轉變為東西兼顧。再者，俄國國家身分定位雖已轉變，但其內蘊的身分衝突依舊不變。在歐亞國家的新身分下，內部交替轉變的仍是俄國自身不變的歐亞文明雙重性遺緒。

俄中關係在俄國國家身分定位調整下亦連帶牽動，雙邊關係不僅正向建構出彼此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為敵」，之後更逐步推動側重文化面的公共外交，以內化其間的角色身分。然而，經由分析可知「世代友好，永不為敵」此一共有文化雖有一定的成效，但在俄中兩國間的基礎仍未穩固，亦未能完全形塑兩國於其間的角色身分，兩國依此進行的互動也未能完全達到彼此預期的目標。因此，才會出現兩國互辦「國家年」之際，俄國卻又在遠東區驅逐華商的情形。

俄中兩國欲發展至自我併入他我之集體身分階段本即不易，除了兩國內在文化向度的類屬身分有別而不易調和外，俄羅斯對自身的文明歸屬亦存在流派之爭。再者，在俄羅斯跨立於歐亞大陸而超脫他者的自恃期許下，此又增添俄中兩國發展集體身分的難度。

俄中兩國今日雖因在反霸與多極化上的身分立場相同而戰略匯合，但隨著美國國力逐漸相對下滑與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新國家身分又不時受內蘊的舊遺緒衝擊，復以俄中彼此共享的角色身分亦未能澈底內化，在種種不利條件下，俄中關係存在黃禍悖論並不令人意外。對俄羅斯而言，與中國越友好才可能消弭黃禍恐懼，方能有穩定的外在發展環境，國家安全也才得以穩固。然而，兩國越是密切友好，如 1990 年代初期免簽旅遊與雙邊合作的加強，卻反倒更讓俄國對中國的黃禍疑懼加深。^⑪

註 ⑩ Караганов, “Вперед в Азию?” с. 1. 如前所述，俄國自彼得大帝尋求融入西方以來，即自我定位為西方國家並以西方為師，此即卡拉噶諾夫為何以「西方」一詞作為進步的象徵。類似的說法亦曾見於現任俄羅斯聯邦人權全權代表盧金（Vladimir Lukin）。時任駐美特命全權大使的盧金即曾傳神地描述俄羅斯獨立後的困境：「俄國過去雖落後於歐洲，卻仍自認領先亞洲。但亞洲此後的迅速發展…使我們發現自己不再處於『進步的歐洲』與『落後的亞洲』間，而是在兩個『歐洲』的陌生環境。」參見 Vladimir P. Lukin, “Our Security Predicament,” *Foreign Policy*, No. 88 (Fall 1992), p. 60.

註 ⑪ 根據拉林的不完全統計，1992 年以來在俄國中央、遠東和西伯利亞的部分報刊上，刊登指責中國向俄屬遠東「擴張」的文章已不下百篇，而這些文章大部分的作者皆為遠東區俄人。參見〔俄〕В. Л. 拉林，「二十世紀初期和末期俄羅斯遠東政策中的『黃禍』綜合症」，*東歐中亞研究*（北京），1996 年第 1 期，頁 87。此處的作者 В. Л. 拉林與另一作者弗·拉·拉林為同一人（弗·拉為 В. Л. 之音譯），皆為文裡曾提及的俄羅斯遠東民族所所長拉林，其全名為 Виктор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Ларин，中文譯名為維克托·拉符連季耶維奇·拉林，英文譯名則為 Viktor Lavrent'evich Larin。

肆、俄國內部互動的身分、利益解構

俄國內部的分歧亦為當代黃禍論復萌的主因之一。誠如拉林所言，俄國內部能否一致合意亦為俄屬遠東黃禍論的癥結。為此，我們有必要再解構俄國內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

一、地方對體制規範的衝撞

影響俄國中央與地方互動的非正式社會規範，可從俄國對外政策的三種理念：大西洋學派、歐亞學派與大俄羅斯帝國主義學派（Great Russian Imperialism）之間的歧異初探端倪。^⑫國家未來何去何從，在俄國向來是爭論不休的議題，橫跨歐亞的俄羅斯究竟是歐洲國家，還是亞洲國家？俄羅斯人是歐洲人、亞洲人，還是歐亞人？其文化是歐洲文化、亞洲文化，抑或歐亞文化？從 19 世紀西化派（Westerziners）與斯拉夫派的爭論即能得知，對於 75% 的領土在亞洲，但 75% 的人口卻在歐洲的俄羅斯，縈繞不已的難題即是東西方身分認同的歸屬與由此而生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在重歐輕亞的思維下，分離主義隨著俄人東進逐漸萌芽，進而勃興。俄羅斯獨立後，聯邦體制在民主化浪潮下的變遷，正是蟄伏已久而甦醒的分離主義，促使地方與中央就彼此定位、權力與體制規範內容競爭的展現。

俄羅斯聯邦於 1990 年 6 月宣布主權宣言後，聯邦境內大部分的自治共和國也跟進拋棄自治身分並宣告自身的主權地位。此一「主權化」歷程直接影響了其他聯邦主體的政治態度，而西伯利亞、遠東與極北地區等地則是最早嘗試轉換體制為獨立共和國者。如遠東區楚科奇自治區（Chukotskii avtonomny okrug）議會即決議將自治區改組成主權共和國，雖未能如願，但之後仍被承認脫離馬格丹州（Magadanskaya oblast'）而直屬於聯邦。^⑬1993 年，在俄羅斯聯邦憲法賦予全國 89 個地區齊頭式平等的法律地位後，境內分離主義的第一波高漲才得以控制。其後，少數民族共和國的主權運動稍有減弱，並與中央簽署雙邊分權條約取得特權，但此亦為後續問題的肇始。以俄羅斯人為主體的邊疆區、州等聯邦主體紛紛訴求與其他少數民族平權，並以法律手段展現其意志，宣布地方法高於聯邦法或地方得以中止聯邦法。此外，地方更拒絕上繳預算，在 1998 年中央政權疲弱之際即曾掀起兩次拒繳風潮，繼西伯利亞托姆斯克州（Tomskaya Oblast'）與遠東區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Khabarovskii krai）拒繳後，其他的州和地區也陸續出現仿倣意圖。

註 ⑫ 大西洋學派主張俄國應儘速融入西方；大俄羅斯帝國學派為極端民族主義者，主張恢復昔日光榮，對西方無端地仇視；歐亞學派則居於西化—斯拉夫化光譜間，主張東西平衡外交，整合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而更獨立於西方。大俄羅斯帝國學派後漸消聲匿跡，其部分主張則融入歐亞學派。可詳見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頁 122~123。

註 ⑬ 趙竹成，俄羅斯聯邦體制的憲政基礎及其衝突（臺北：韋伯文化，2002 年），頁 56~57。

面對地方高漲的離心傾向，時任總統的葉爾欽（Boris Yeltsin）為確保國家統一與政權穩定，除發布總統令規定由總統任命地方首長外，更多次凍結箭在弦上的地方首長直選，之後又頒布條例規定地方首長只對總統負責，但隨之而來的則是連串的反彈。如葉爾欽本欲撤換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州（Irkutskaya oblast'）州長，卻因西伯利亞地區地方首長合組的「西伯利亞協議」（Siberian Agreement）激烈抵制而作罷。1995年，葉爾欽為避免當年國會下院—國家杜馬（State Duma）選舉與翌年總統大選受擾，又於同年9月再度凍結地方首長直選，未料卻引起更強烈的反彈。若干聯邦主體不僅宣布總統令無效，更逕行制定、通過有利直選的法規。葉爾欽最後為了總統大選而不得不妥協，並同意選後將推行地方首長直選。地方首長直選儘管被多次凍結，但在1996年全面實施前，全國已有39個聯邦主體辦理直選，其中更有20多個少數民族共和國與自治共和國未知會中央即逕自舉辦。^④

葉爾欽起初為對抗國家杜馬強大的反對派，而藉由地方首長所組成的國會上院—聯邦委員會（Federal Council）制衡前者，並以資源分配手段籠絡、分化地方首長，使聯邦委員會與其處於同一戰線。但本有離心傾向的地方首長在直選賦予民意基礎後，卻反而更敢同中央抗衡，最後終於演變為中央對地方莫可奈何的局面。

地方立法與中央法規的抵觸以及地方首長直選風波，充分體現地方對聯邦體制規範的衝撞，而在俄中邊境最前線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區裡，1990年代初露復萌端倪的黃禍論更被有心人士刻意操作。儘管外交部官員們咸信境內非法移民現象並非中國所蓄意策畫，但中國執行北進戰略之說卻普遍為俄國民眾採信。根據遠東民族所的調查，在遠東區南部便有64%的民眾憂慮中國的人口擴張。反華浪潮的高漲遂為若干地方首長操作運用，藉以提升自己的支持度。1997年1月，濱海邊疆區（Primorskii krai）當局更出版一份名為「中國對俄羅斯遠東的政策」（The Policy of the PRC toward Russia in the Far East）文件，闡述中國對遠東區的侵略，並說明遠東區總是屈從於周邊國家的擴張，而其中又以中國為甚。^⑤同年10月，前濱海邊疆區首長納茲德拉欽柯（Yevgeny Nazdratenko）甚至命令濱海邊疆區的市場管理者只能與中國貿易公司簽約，以杜絕中國個體戶在當地進行商業活動的任何可能。^⑥

另一與人口擴張黃禍論如影隨形的劃界議題亦隨之浮現，現任遠東區總統全權代表暨遠東發展部部長，時任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首長的伊沙耶夫（Viktor Ishaev），其與納茲德拉欽柯亦曾就此向中央猛烈抗爭。伊沙耶夫對於俄中兩國1991年的協議尤其不滿，認為允許中國船隻航行黑龍江與烏蘇里江的作法，將置伯力於未知的風險中。伊沙耶夫更敦促中央推翻該約，並要求外交部在未獲邊疆區當局的同意下，不得討論任何與他所轄邊疆區有關的領土問題。但伊沙耶夫的態度之後卻逐漸轉為低調，並低

註④ 董曉陽，*俄羅斯利益集團*（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頁208。

註⑤ 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 Century* (Armonk, N.Y.: M.E. Sharpe, 2003), pp. 168-170.

註⑥ “Наздратенко запретил китайским ‘челнокам’ торговать,” (納茲德拉欽柯禁止中國的「穿梭」貿易) *Коммерсантъ* (商人報), No. 181 (1363), 22 октября, 1997, <http://www.kommersant.ru/doc/186183>.

姿態地與中央協商彼此的歧異。^{⑥7}納茲德拉欽柯則是相對激進，在俄中東段國界未定之際，即反對兩國劃界協議，並宣示只要其在位一天就不會割讓任何一寸領土。^{⑥8}

1995年10月，地方和中央在邊界議題的衝突達到頂點，俄中兩國的劃界即因濱海邊疆區的牽制而未能遂行，迫使葉爾欽頒布行政命令要求納茲德拉欽柯配合。納茲德拉欽柯因而隱身幕後，改由地方議會抨擊葉爾欽所為不僅違憲又違背國家利益。納茲德拉欽柯更從聯邦委員會著力，欲將劃界議題排入議程，葉爾欽為此不得不正式警告納茲德拉欽柯，要求他必須遵守憲政規範，並得和外交部的聲明作為一致。但納茲德拉欽柯依然故我，濱海邊疆區與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傳媒更在地方當局的支持下對中央發起黃禍論宣傳戰。納茲德拉欽柯之後更於1999年地方首長選舉彰顯黃禍論，表示遠東區未來將因為中國移民和邊界爭議而成為「亞洲的巴爾幹」。^{⑥9}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所長董曉陽即表示，當年濱海邊疆區在納茲德拉欽柯治下已幾近成為中央鞭長莫及的獨立王國。濱海邊疆區過去曾有獨立自主的短暫歷史，1920年至1922年間即為緩衝區—遠東共和國（Far Eastern Republic）的一部分。蘇聯解體後地方分離主義滋長初期，遠東區的離心傾向與重建遠東共和國的主張亦隨之活躍。納茲德拉欽柯每逢中央對其施壓，或對中央的要求未果時便警告中央：長此以往，濱海邊疆區將很可能脫離俄羅斯。他之後更與伊沙耶夫及薩哈林州（Sakhalinskaya oblast'）州長三人向中央發難，抱怨莫斯科待遠東區不公，希望脫離中央掌控而自行解決經濟轉型問題。^{⑦0}

綜觀1990年代地方對聯邦體制規範的衝撞歷程，我們能見到地方政治菁英意圖改變現狀而操弄黃禍論，將自我的認知與所面臨的黃禍威脅作一連結，使體制規範朝有利於己的方向轉變，進而為己所用。中國移民人口擴張帶給俄人的危機感若是無形壓力，俄中兩國的歷史疆界爭議則為此提供有形基礎。遠東區的政治菁英因而交互運用非法移民與劃界議題，以遂行黃禍論的炒作。地方政治菁英附加其所認知的社會意義（social meaning）^{⑦1}於當地民眾，喚醒群眾意識到自己處於國家邊陲而被邊緣化；地方

註⑥7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p. 173.

註⑥8 “Russia Hands Over Land to the Chinese,” *Pointer*, Vol. 3, No. 6 (June 1996), p. 3.

註⑥9 Евгений Наздратенко, (納茲德拉欽柯) *И вся Россия за спиной...* (與後方的俄羅斯全國…)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9), с. 20–24.

註⑦0 董曉陽，*俄羅斯利益集團*，頁314–317。就作者在海參崴的查訪所知，納茲德拉欽柯在濱海邊區的評價相當兩極，有人稱其遠東共和國的構想是相當瘋狂的舉措，有人則認為其維護地方利益功不可沒，但也有人態度保留，認為納茲德拉欽柯功過難斷，原因在於納茲德拉欽柯執政後期醜聞不斷，致使其毀譽參半。納茲德拉欽柯其人其事可參見董曉陽，*俄羅斯利益集團*，頁314–331，以及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Мурсалиев (穆爾薩利耶夫),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лица: Краевой губернатор пошел по краю,” (劇中人：邊疆區首長開始遊走邊緣)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Власть* (商人—權力), No. 33 (192), 3 сентября, 1996, с. 22–25。

註⑦1 社會意義意指團體內的菁英如何建構團體相對於他者的地位與關係，其藉由歸屬於某種類別的方式，敘述人們如何理解每日的生活。參見 Henry E. Brady, Cynthia S. Kaplan,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Ethnic Identity,” in Ravi Abdelal,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 eds., *Measuring Identity: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5.

政治菁英繼而又灌輸群眾起而抗衡中央的社會目的 (social purposes)，^⑦以正當化其抗爭舉動，讓群眾了解到惟有循此途徑，中央才會關切地方的發展，縱使與中央抗衡的代價高昂，甚至於「脫歐入亞」亦在所不惜。在地方政治菁英的刻意操作下，遠東區欲「脫歐入亞」的離心地域社會身分逐漸被形塑而成。據個人在當地的了解，「中國人在遠東區是否過多」確實是極易煽動的議題。當地俄人即曾向個人表示，他們平日並不會刻意留意，但若有人提醒便會覺得似乎的確如此。^⑧是故，地方政治菁英操弄黃禍論的效應可謂加乘作用，在民眾原已存在該意識的情況下，稍加挑撥便如燎原之火一發不可收拾。面對地方勢力如脫韁野馬般地難以掌控，處於俄中關係與國內互動兩組關係交集的莫斯科，對地方操作黃禍論之舉僅能更加低調以對。

二、中央對體制規範的再造

為強化中央與地方的聯繫並壓制地方高漲的分離主義，普京 (Vladimir Putin) 於上世紀末繼任總統後，即訴諸正式法律規範改革聯邦體制，並強調大國光榮、國家觀念和強有力的國家體制，以約束、匡正潛伏於中央和地方間的非正式社會規範－分離主義。2000 年 5 月，普京發布總統令將全國劃為七大聯邦區，並於各區派駐直接向總統負責的全權代表以監督地方首長，同時讓地方聯邦機構脫離地方首長掌控。另一方面，普京又以應給予地方首長更多時間留意地方政務為由，使其免兼聯邦委員會委員一職，改由地方首長任命經地方議會批准的人選出任。普京欲削弱地方首長政治影響力之意昭然若揭，儘管得到國家杜馬的支持，卻也引起聯邦委員會的反撲，但地方首長們在形勢逼人強下也僅能接受。普京繼而修改與聯邦法律相悖的地方法規、加強對地方首長選舉的干預，更以政治手段調離異議者。2005 年起，地方首長一職更由直選改為總統提名經地方議會批准。中央藉由提名人選、解散地方議會與隨時解除首長職務等方式，使地方首長轉而直接向總統負責，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亦開始朝向中央集權化的上下隸屬關係演進。

中央對遠東區的加強開發也齊頭並進，2000 年至 2001 年間即宣示將加強開發與修訂開發計畫，俄中東段未定界亦於 2004 年勘定；莫斯科除於 2006 年 6 月核准境外俄人返鄉計畫外，2007 年又對既有的開發計畫推陳出新，2009 年年底更將展延的開發計畫提升至開發戰略，並與「2030 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配套，意圖以油氣開發和能源出口戰略東移帶動遠東區的發展。但中央對地方的重新掌控亦非自始順遂，2001 年 4 月濱海邊疆區首長選舉的一波三折即是一例。^⑨前遠東區總統全權代表普利科夫斯基 (Konstantin

註 ⑦ 社會目的能正當化和刺激團體內部的權力、地位與資源的分配，讓團體成員願意對待自己的團體有別於他者，縱使代價昂貴亦然。參見 Brady, Kaplan,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Ethnic Identity," p. 35.

註 ⑧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與烏蘇里斯克的訪談。

註 ⑨ 年輕且從未涉足政壇的達里金 (Sergei Dar'kin) 在兩輪投票後，才擊敗當時咸信為中央所支持的遠東區總統第一全權副代表阿帕納先科 (Gennadii Apanashenko)，此一得來不易的結果頗耐人尋味。類似的情況也曾出現於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州。參見 Anatoly Medetsky, "Federal envoys, Tolstoshein's comeback impact election," *Vladivostok News*, May 11, 2001, <http://vn.vladnews.ru/Arch/2001/ISS260/News/News01.HTM>.

Pulikovskii) 更指出當地政商糾葛的諱莫如深，並自承無力改變遠東區原物料出口所課關稅極低的異象，認為維持低出口關稅應是為圖利某人之故。^⑤儘管幾經波折，但目前局勢大抵已在莫斯科的掌控之下。

在中央對聯邦體制規範的再造裡，我們同樣能見到前述地方政治菁英操弄黃禍論的相似模式。莫斯科在國內習得地方操作黃禍論衝撞聯邦體制規範的認知，以及遠東區當地黃禍再起的隱憂後，^⑥因而訴諸大國情感與民族意識的社會意義於民眾，進而達到維繫國家完整的社會目的，以消弭不同地域俄人間的離心地域社會身分。實際因應作為即是改革聯邦體制，完善正式法律規範以消除非正式社會規範一分離主義的衝擊，並適時推動境外俄人返鄉與加大對遠東區的開發力度，而維持俄人在當地的一定數量，更導入身分取向的移民法規範，以匡正在遠東區中國移民客工的身分，從而防堵黃禍再起，而非著眼於俄中經濟合作物質利益取向的最佳化路徑抉擇。

三、身分、利益的轉變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由蘇聯的行政區劃轉換身分變為獨立國家，俄羅斯境內的聯邦主體也意圖跟進，尋求從被支配者轉變為支配者，此即展現於地方支配自身資源的訴求。但聯邦主體的劃分標準又有民族與區域屬性之別，此即日後聯邦條約與聯邦憲法應運而生之故。各聯邦主體於政經轉型初期競相爭取合己所需的體制規範，其立足點即為自身的身分認同和利益。

有別於以民族屬性劃分的自治共和國、自治區或自治州，邊疆區和州則以區域為劃分標準，居民亦以俄人為主。然而，在遠東區卻又不然，遠東區雖然包含以少數民族為名之自治區、自治州或共和國，但我們從排華移民法於 2007 年初生效前的人口普查資料即能得知：俄羅斯人在當地實際上仍是優勢民族，僅在薩哈共和國 (Respublika Sakha) 屈居第二，但與薩哈人亦相差無幾。(參見表 8)

由遠東區各聯邦主體的族群比例，我們能了解到一般民族自治共和國所感受的歧視，在遠東區其實相對於其他聯邦地區極低。遠東區與中央的身分隔閥實出於視界歧異所致，而與他處所感受的種族歧視無關。

註⑤ Александр Рылов, (雷洛夫)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中國的警告)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文學報), No. 42, 12 октября, 2005, с. 3.

註⑥ 如 2000 年普京結束中國、韓國之行後，在遠東區準備赴日訪問前夕即指出，中央若再不對遠東區積極開發，當地居民未來將有改說日文、中文或韓文的可能。參見 Дмитрий Косырев, (科錫列夫) “Путин поставил вопро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блема не в том, на каком языке будут говорить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и, а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осмыс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осквы в этом регионе России,” (普京提問，是語言或政治？問題不在於遠東區居民未來將說何種語言，而在於莫斯科將採取何種理性政策)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獨立報), 22 июля, 2000, с. 1. 依普京所言，遠東區似有「亞洲化」(Asianization) 隱憂，但從後續境外俄人返鄉計畫的推動與針對性極強的排華移民法觀之，普京真正擔憂的顯然是中國化—中國移民黃禍再起，而非亞洲化。

表 8 遠東區各聯邦主體內部族群比例（2002 年）

濱海邊疆區	俄羅斯人 89.89%	烏克蘭人 4.54%	朝鮮人 0.86%	韃靼人 0.70%	白俄羅斯人 0.56%
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	俄羅斯人 89.82%	烏克蘭人 3.38%	那乃族 0.77%	韃靼人 0.76%	朝鮮人 0.66%
薩哈林州	俄羅斯人 84.3%	朝鮮人 5.4%	烏克蘭人 4.0%	韃靼人 1.3%	白俄羅斯人 1.0%
阿穆爾州	俄羅斯人 92%	烏克蘭人 3.5%	白俄羅斯人 0.8%	韃靼人 0.5%	其他 3.2%
馬格丹州	俄羅斯人 80.17%	烏克蘭人 9.89%	埃文人 1.38%	白俄羅斯人 1.19%	韃靼人 1.10%
堪察加邊疆區	俄羅斯人 83.14%	烏克蘭人 5.95%	其他 3.42%	韃靼人 1.02%	白俄羅斯人 1%
猶太自治州	俄羅斯人 89.94%	烏克蘭人 4.44%	猶太人 1.22%	韃靼人 0.63%	白俄羅斯人 0.62%
楚科奇自治區	俄羅斯人 51.9%	楚科奇人 23.5%	烏克蘭人 9.2%	其他 8.2%	愛斯基摩人 2.9%
薩哈共和國	薩哈人 45.5%	俄羅斯人 41.2%	其他 6.2%	烏克蘭人 3.6%	鄂溫克族 1.9%
備註：僅取前五名的族群。另自2007年7月1日起，堪察加州（Kamchatkaya Oblast'）與科里亞克自治區（Koryakskii avtonomny okrug）已合併為堪察加邊疆區（Kamchatskii krai）。					

資料來源：綜整自“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2002 года,” (2002 年全俄羅斯人口普查)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聯邦國家統計署) <http://www.perepis2002.ru/index.html?id=87>. 是項普查於 2002 年 10 月間進行，為俄羅斯獨立後首次進行的人口普查，並於 2004 年至 2005 年間陸續公布。

行為體為展現某種認同或身分，常會在有意或無意間遵守、實行符合規範的政策和行為。俄國中央與地方也在無形間表達自身的立場與認同，將己所認知的身分付諸實踐。經濟相互依存固然有助於集體身分的醞釀，但若有一方自認遭受剝削，此種依存反倒會變為分歧根源，進而又擴大分歧，而在遠東區正是如此。

在社會身分的形成邏輯裡，相較於自然抉擇（natural selection）演變的漸進，模仿（imitation）則有迅速轉變的效果。^⑦ 1917 年「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s）雖然在月餘內迅速擴展勢力至俄國中部，但實際能控制的範圍卻僅限於當時的彼得格勒（Petrograd）與莫斯科，在邊疆區與鄉村則遭到其他社會主義政黨與布黨非主流派系的抵制；而布黨為延續政權所推行的「戰時共產主義」（Military Communism）又讓農民與其更為隔閡。1918 年揭幕的內戰期間，蘇維埃（Soviet）政權起初的主要威脅即來自東方，西伯利亞歐姆斯克（Omsk）的保守政權更獲得當時協

註⑦ 溫特曾區分身分形成的邏輯為自然抉擇與文化抉擇。自然抉擇意指生物體難以適應競爭、無法再造，故為他者所取代。自然抉擇不要求屬性的轉變，即便屬性有所轉變，亦為通過載體的演化，而非通過身分、利益的抉擇，故為物質進程。文化抉擇係直接通過行為體的認知、理性與意圖運作，如模仿與社會習得等決定行為的因素代代相傳。詳見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21~322, 324~325.

約國（Entente Powers）聯軍的支持。「十月革命」後的內戰表面上雖是俄國內部不同勢力的權力競逐與理念展現，卻無異為昔日農民起義和 20 世紀初期革命風潮的延續及另類模仿。

邊陲地區的相對被剝奪感則隨著俄人的東進與日俱增，早在 1860 年代西伯利亞當地即有自許為「西伯利亞人」的西伯利亞愛國主義（Siberian Patriotism），並自認有別於其他斯拉夫人。在中央持續剝削西伯利亞「殖民地」下，他們自信其特質可藉由自治而完全呈現。^⑧內戰結束後，1920 年成立的遠東共和國更能說明當地居民被邊緣化之感。當時因海參崴遭到日本佔領，中央為此成立遠東共和國傀儡政權充作屏障，待日本於 1922 年撤退後，遠東共和國便被併入並更名為遠東邊疆區。蘇聯時期，對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開發向來存在兩派對立的見解，一為榨取當地資源以促進歐俄發展，另一則為帶動當地開發使其自給自足，^⑨但事後顯然是前者獲得實踐。因此，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的角色並未因政權嬗遞而有所轉變，仍與帝俄時期無異。

行為體意識到成功即會模仿，成功的標準則由依文化環境而變的共有理解所建構，故標準又因文化環境而異。^⑩俄羅斯獨立後的內部共有理解—民主化浪潮，即決定了模仿的標準與過程：邊陲被邊緣化與抗衡剝削的離心傾向，則於無形間代代相傳。出於自力救濟或能為國家帶來更好發展的身分經驗，遠東區聯邦主體因而仿效他人向中央抗爭的成功經驗，以形塑自我的身分及權利。

有別於模仿，社會習得（social learning）則是強化已習知的身分和利益。^⑪因鏡式反映（mirroring）之故，在地方自覺受剝削下，中央即便加大開發力度，卻仍讓地方認為是舊日俄化殖民歷程的重覆延續，因而又強化過往習得的被剝削感。中央自覺地方難以掌控，又因地方離心傾向高漲與地方自覺被邊緣化而訴求關注之故，反倒又強化中央所習知的不信任感。^⑫在模仿與習得的交互作用下，中央與地方彼此的身分隔閡因而更加強化。

註 ⑧ Stephen Kotkin,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U.S.A.: M. E. Sharpe, Inc., 1995), p. 5.

註 ⑨ Kotkin, Wolff,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p. 187.

註 ⑩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25~326.

註 ⑪ 溫特以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t）說明身分及其相應利益的如何習得。首先，行為體習得身分與利益後，再根據有意義的他者待己的方式作出相應的反應，該反應又強化習得的身分與利益。此即所謂的反射評審與鏡式反映，亦即行為體自我的認知係以他者為鏡的再現自我。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26~327.

註 ⑫ 中央對地方的不信任感，亦能從帝俄末代首相斯托里賓（Pyotr Stolypin）於 1910 年視察西伯利亞後的感想探知端倪。斯托里賓推行農業改革並鼓勵拓殖西伯利亞，以消化無產的青年農民，但因當地並無貴族存在，故斯托里賓認為此反倒可能在當地孕育出個人主義與資產階級。斯托里賓為此有感而發地表示：「一個廣袤、原始的民主國度，即將掐住歐俄的喉嚨」。參見 David Mackenzie,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4th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 Co., 1993), p. 488.

拉林即指出，西伯利亞自葉瑪克（Yermak Timofevitch）^⑧時期對許多俄人而言，即為希望無法實現之地，也很難相信會在世紀之交破例。從改革與民主化開始，俄羅斯最致命的就是決而不行，遠東區自也不例外，實踐證明歷年來解決遠東區問題的資金總是未能到位。^⑨但不同的看法亦有，遠東國立大學（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區域研究系主任別切利查（Vladimir Pecheritsa）教授則認為今日遠東區已得到中央的支持。過去由於經濟停滯，國內問題千頭萬緒，中央才無力顧及，故中央與地方間的疏離並不嚴重。至於地方首長對抗中央，甚至於煽動黃禍論，也是為了保護本地民眾的就業權益而不得不然的作為。^⑩

相對於拉林與別切利查兩人看法的南轅北轍，列雅柏切科的見解則相對緩和。列雅柏切科認為區域發展的差異的確客觀存在，但莫斯科和聯邦其他區域僅有經濟發展程度的區別，我們仍是同一個國家。遠東區和中央之所以疏離，肇因於我們政府的效率低落，但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也和文化、民族的因素有關。俄羅斯的疆域過於龐大，我們需要更有效率的政府，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人民希望政府效能提升，而政府則應該要改進效能。就這一點而言，莫斯科確實是該被檢討。^⑪

鑒於當地學者見解的歧異，個人為此曾就遠東區民眾對莫斯科的信任度作一採訪，了解中央所訴諸的社會意義與社會目的是否為民眾採納，但採得的趨勢顯示：地方對中央的信任仍舊不足。

從表 9 的調查可知，當地過半數民眾知道莫斯科於 2007 年曾將開發計畫推陳出新，近六成民眾亦認為此有益於當地，但有趣的是在收回的問卷上卻出現「倘若有實施的話…」的註記。不少民眾亦表示，中央的開發計畫最後真正實施的並不多，更有人抨擊在海參崴興建中的跨海大橋，僅是為在 2012 年海參崴亞太經合會（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時炫耀國力。^⑫據個人觀察，跨海大橋對疏導港口物流與改善交通有其正面作用，但迫切性卻是能討論的，故也不難理解地方的想法為何與中央有所落差。

調查也發現近半數民眾認為中央不了解地方需求，有六成的民眾即不知中央推動境外俄人返鄉計畫以化解當地的人口危機，47.5%的人雖然認為返鄉計畫有益於當地，但認為無益與難以回答的比例卻又甚於前者。（參見表 9）

註 ⑧ 葉瑪克在俄人對西伯利亞的探索與殖民進程裡有其象徵性地位。葉瑪克本為通緝在案的逃犯，因在一次私人軍事行動裡攻下庫臣汗國（Kuchun Khanate）都城－西伯利亞城有功而獲赦免，迄今仍被視為英雄事蹟流傳。

註 ⑨ 弗·拉·拉林，「俄羅斯總統的太平洋倡議與俄中關係」，西伯利亞研究（哈爾濱），第 34 卷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12~13。

註 ⑩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遠東國立大學符拉吉沃托克國際關係研究所（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ВГУ）的訪談。

註 ⑪ “Russia Hands Over Land to the Chinese,” *Pointer*, Vol. 3, No. 6 (June 1996), p. 3.

註 ⑫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火車站的訪談。

表 9 遠東區民眾對中央在當地開發成效的觀感（2009 年）

您知道莫斯科在 2007 年頒布的遠東暨外貝加爾區系列開發計畫嗎？	知道	不知道	
	55%	45%	
您認為遠東暨外貝加爾區開發計畫對當地有幫助嗎？	有	沒有	難以回答
	57.5%	0%	42.5%
您知道莫斯科近年鼓勵境外居留同胞自願返鄉嗎？	知道	不知道	
	40%	60%	
您認為境外居留同胞自願返鄉有助於解決當地的人口危機嗎？	有	沒有	難以回答
	47.5%	7.5%	45%
近年莫斯科努力地開發遠東區，您認為中央了解地方的需求嗎？	了解	不了解	難以回答
	35%	45%	20%

資料來源：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與烏蘇里斯克的訪察。

當地民眾有時亦對中央的政策大感不解。如莫斯科計畫於濱海邊疆區設置賭博專區以吸引中國、日本遊客，再以巨額稅收和豐厚收益帶動發展的構想，便有民眾感到極度納悶。據當地俄人表示，今日俄羅斯之所以全面禁賭，原因即在於賭博業帶來的社會問題極其嚴重，禁賭當然是好事，但在遠東區開設專區安置眾人視為毒瘤的賭博業，又置遠東人的感受於何地？⁸⁸

在遠東民族所後續的調查裡，地方對中央的不信任感又能獲得進一步的印證。從表 10 可知，近半數的遠東區民眾認為中央的開發僅是為了攫取當地豐沛的自然資源而圖利財團，有 21% 的民眾認為開發的目的在於消弭遠東區的離心傾向，而認為中央有意將遠東區開發為國內高度發展地區者則僅有 14%。

表 10 俄羅斯當局實施遠東開發計畫的目的為何？（2010 年）

為俄國或外國財團企業取得遠東區的自然資源	49%
將遠東區留在俄羅斯聯邦	21%
將遠東區開發為高度發展地區	14%
為俄羅斯創設整合加入亞太地區的平台	11%
消除社會對立	11%

資料來源：資料與數據摘自於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拉林) Лилия Ларина, (拉林娜)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ТР в зеркал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прос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г.),” (俄羅斯於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安全與合作的民意反映 (根據 2010 年遠東居民訪談的結果)) *Россия и АТР (俄羅斯與亞太地區)*, No. 1 (2011), с. 59~60. 儘管資料來源的圖形圖備註說明此為單選題，但數據加總後卻為 106%。作者再確認引述資料的文字說明後，發現「為俄國或外國財團企業取得遠東區的自然資源」、「將遠東區留在俄羅斯聯邦」與「將遠東區開發為高度發展地區」的數據皆有對應說明，但「為俄羅斯創設整合加入亞太地區的平台」與「消除社會對立」的部分則無。因此，後兩者其中之一的數據若非印刷錯誤，不然即為拉林與拉林娜所言之調查在海參崴較偏遠的地區，由於資金與訪談人員專業不足所致的誤差。儘管如此，此一調查結果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註 88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蘭泡與海參崴的訪談。

此外，在遠東民族所的調查裡顯示，有高達 56%的民眾認為中央無法改善遠東區與當地居民的社會經濟地位，僅有 21%認為中央有能力改善，難以回答的則為 22%。持負面看法者又以濱海邊疆區與伯力兩地為最，分別為 62%與 56%，遠高於比羅比贊（Birobidzhan）^⑧的 35%與南薩哈林斯克（Yuzhno-Sakhalinsk）^⑨的 44%。認為中央在剝削當地自然資源而圖利財團的比例，在海參崴與伯力兩地依然偏高，各為 54%與 49%，在猶太自治州（Yevreyskaya avtonomnaya oblast'）則為 33%。至於將遠東區轉變為國內高度開發地區之說，在海參崴、伯力、馬格丹（Magadan）^⑩與烏蘇里斯克等地僅有 9%至 11%的民眾認同，在薩哈林州與海蘭泡的比例則提升為 26%至 27%。^⑪

在遠東區民眾普遍自認遭到中央剝削下，彼此的疏離感因而越來越深，甚至認為莫斯科錯誤的政策為俄羅斯遠東利益的最大威脅。2003 年，與中國接壤的四個聯邦行政區皆視中國為最大的威脅，雖然也有相當的比例認為中央必須為政策的錯誤負責，如比羅比贊當年即將莫斯科與中國的威脅等而視之。然而，2008 年時除阿穆爾州（Amurskaya oblast'）外，其他三者卻幾近口徑一致地將莫斯科的政策錯誤轉列為頭號威脅。（參見表 11）

表 11 對於威脅俄羅斯在遠東利益的看法（就威脅源頭而言）？（2003 年、2008 年）

行政區	年份	中國	美國	庫頁島問題	莫斯科	朝鮮半島	無
濱海邊疆區	2003	46%	40%	43%	23%	14%	12%
	2008	30%	29%	27%	44%	5%	3%
哈巴羅夫斯克	2003	54%	38%	39%	39%	15%	1%
	2008	43%	45%	14%	51%	6%	8%
比羅比贊	2003	48%	35%	42%	48%	8%	4%
	2008	36%	30%	30%	72%	0%	6%
阿穆爾州	2003	27%	12%	27%	24%	3%	21%
	2008	34%	46%	19%	39%	4%	7%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自 Ларин,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с. 76; Ларин, Ларина,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с. 47.

此固然讓人懷疑是否為了配合莫斯科近年歸咎於己的說法，但亦可反向解讀：正因為中央政策錯誤致使遠東區發展落後，遠東區才会有黃禍威脅感受，當地的離心傾向也因而未曾消弭。

在另一份導致俄羅斯失去遠東區的威脅為何的調查裡（參見表 12），我們則能清楚地了解到：遠東區人口銳減與外來移民增加，是當地民眾認為最可能導致俄羅斯失去遠東區的主因。其次則為亞太地區周邊國家構成的安全威脅，而中國又在美國、日

註⑧ 猶太自治州首府。

註⑨ 薩哈林州首府。

註⑩ 馬格丹州首府。

註⑪ Ларин, Лари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ТР в зеркал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прос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г.),” с. 60.

表 12 俄羅斯失去遠東區的威脅源頭（2010 年）

當地人口銳減而外來移民增加	42%
周邊國家帶來的安全威脅	35%
莫斯科漠視遠東區的利益	34%
與西伯利亞、歐俄經濟聯繫的弱化	24%
俄羅斯裁減亞太地區的駐軍	18%
全球化進程	4%
遠東區的分離主義傾向	3%

資料來源：摘自 Ларин, Лари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ТР в зеркал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прос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г.),” с. 55. 是項調查為複選，但不超過 3 個答案。

本與南北韓等國家裡居於首位，有高達 64% 的民眾視中國為俄國東疆的安全威脅。此外，莫斯科對遠東區利益的漠視也和亞太周邊國家構成的外部安全威脅不相上下。^㉔

長此以往，中央與地方的身分認知隔閡自然加深，遠東區民眾也難以相信莫斯科真正視當地為穩定國家的關鍵後方。2009 年 9 月，個人在遠東區曾以國籍和民族欄位開放填寫的問卷進行調查，以區別受訪者在社會互動後所自我認知的類別與情感歸屬，所探得的趨勢顯示：區域屬性對當地居民的身分認同影響，已較民族屬性有過而無不及，亦即自認是遠東人的身分抉擇，已和自認是俄羅斯人的比例不相上下。^㉕然而，遠東區由疏離所致的離心傾向又與其他聯邦主體所訴求的分離主義不盡相同，遠東區的訴求並不在於獨立或自治，而是在為自認所受的殖民剝削與邊緣化待遇向中央抗爭。因此，在拉林與拉林娜的調查裡，當地的離心傾向當然不致於讓遠東區脫離俄羅斯而獨立（參見表 12）。事實上，獨立亦不利於遠東區，失去中央奧援，遠東區反而更無籌碼和外國交涉，更容易淪於不利地位。遠東區民眾普遍不信任中央，但離心傾向的聲浪又不若以往，此一現象與莫斯科近年對地方分離主義的強力壓制有極大的關聯。^㉖

普京執政後，聯邦體制規範已由平等身分結構逐漸上下隸屬化；地方雖一度曾為支配者，但又淪為過往的被支配者，昔日抗衡中央的情形亦難再現。遠東區民眾即曾向個人表示，今日莫斯科對地方首長人選有完全的決定權，如在濱海邊疆區只要是莫

註 ㉔ Ларин, Лари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ТР в зеркал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прос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г.),” с. 54~55.

註 ㉕ 在問卷的民族欄位裡，幾近所有的受訪者均填寫自己為俄羅斯人，僅有一位填寫薩哈人。此外，調查發現自認為是俄羅斯人的比例為 45%，遠東人為 30%，當地人為 17.5%，難以回答則為 7.5%。其中，當地人係以受訪者所在地區為判定標準，如在濱海邊疆區所作的問卷調查，選項即濱海人。儘管自認為是俄人的比例居冠，但若將遠東人和當地人的區域屬性抉擇加總，便能得知兩者的總和已超越自認是俄人的比例。

註 ㉖ 如拉林撰文為遠東區發聲時即刻意聲明，以免誤觸鼓吹分離主義的禁忌，其表示：「倘若過半民眾認為國家的政策是主要威脅，且僅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應與歐俄發展關係，卻有兩倍的比例偏好日本與中國—這不意味著遠東區的分離或自治，而是證明『西方並不會幫助我們』。」拉林此處所言的「西方」自是莫斯科。詳見 Ларин, Ларина,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с. 58.

斯科決定的人選就篤定出任，地方議會亦僅是徒具形式，現在已不可能再有第二個納茲德拉欽柯。倘若碰到不好的領導人，人民只能等待四年一次的改選，但因為目前的生活至少比以前好，因此還能忍受。^⑥由此可見，當前中央所再造的聯邦體制規範，若就鞏固隔閡而言，可謂已完全自上而下地發揮構成性（constitutive）效果，將莫斯科的認知與其所欲壓制的地方分離主義連結，並在實踐裡讓人民自覺地或理所當然地認同，而地方與民眾的實踐又讓規範得到強化；但若就調和彼此屬性而言，卻僅具限制性效果。

遠東區民眾今日普遍對生活感到無奈。以遠東區乃至於全俄皆缺乏的紡織品為例，當地民眾即表示地方上若有人想投資紡織輕工業，非但未能獲得政府扶持，反倒會被課以重稅。如此一來，遠東區的紡織業自然無法與來自中國的紡織品競爭，最後只能繼續依賴進口或行之有年的穿梭貿易。個人對此也同感不解，曾趁機請教當地學者。遠東民族所副所長傅樂吉（Sergei Vradiy）則表示，政府有本身的問題仍待克服；再者，政府和私人企業的關係有時其實相當緊張。俄羅斯是幅員如此遼闊的國家，治理極其不易，所以仍需要時間克服種種方方面面的問題。^⑦

在中央與地方未能交互主觀互動下，實難相信當前的體制規範能調和已有隔閡的身分屬性，政策即便發揮構成性效果，亦非地方所期待的平等關係。民眾泰半認為今日現狀係中央政治手段使然，使地方不得不聽從，此亦離心傾向何以難以消弭之故。

在自認遭受漠視而中央又無法有效解決當地的開發困境，復以當地人口仍不斷流失中，面臨一江之隔中國龐大人口壓力的遠東區，^⑧其所感受的黃禍恐懼只會隨著俄國內部隔閡加深而與日俱增。據個人的了解，遠東區每逢選舉之際，黃禍議題便常被候選人端上檯面，並指控某人若當選即無異將遠東區拱手讓與中國。此不僅與臺灣藍綠統獨對峙的張力相若，又凸顯當前遠東區與中國的隔閡。^⑨是故，昔日地方鼓吹、煽動黃禍論對抗中央之舉的再現，恐怕也僅是時間的問題。

伍、黃禍論的復萌與未來可能發展

冷戰後俄中國力此消彼長，俄羅斯會懷疑黃禍再起相當合理，其中又以對中國在遠東區的人口擴張尤甚。然而，在帝俄末年、蘇聯乃至於當代的俄羅斯，我們都能發現俄人對中國人口擴張的黃禍陰霾感受如影隨形地存在，但一度為歐洲陸權的俄羅斯帝國與曾和美國對峙的蘇聯，絕非百餘年來飽經內憂外患的中國所能望其項背。可見

註⑥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的訪談。

註⑦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的訪談。

註⑧ 作者走訪遠東區途經海蘭泡時，當地俄人即提及海蘭泡居民約 20 萬人，並反問作者是否知道對岸中國東北有多少中國人？對方後來告知有 1 億 1,000 萬人。由於海蘭泡與對岸的黑龍江省黑河市距離最近之處亦不過 750 公尺，作者反問倘若對岸中國人游泳過來的話，那該如何是好？對方則低頭苦笑不語。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蘭泡的訪談。

註⑨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與烏蘇里斯克的訪談。

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的復萌，絕非物質與利益的表層詮釋即能釋疑，而需要更深層蘊含的剖析。

承前對促成當代黃禍論復萌之兩組關係的解構，以下將反向釐清黃禍論如何復萌，並嘗試推論其未來可能發展。

一、黃禍論的復萌

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係於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兩組關係的身分調整建構下而逐步復萌。蘇聯解體後，俄中兩國頻繁的互動觸發俄人古老的歷史集體記憶－黃禍，而俄國內部中央與地方之間此時亦因身分、認知的歧異，使得彼此關係負向建構發展，間接提供有利黃禍論復萌的環境。

與此同時，冷戰後國際格局的驟變迫使俄羅斯逐步調整國家身分定位，表徵於外即為其外交轉型，俄中關係因而對應調整。但俄國國內橫亘已久的東西方歸屬問題亦於此時浮現，1990年代前期主政的大西洋學派即因其理念偏好，而對地方鼓吹黃禍論低調以對。^⑩蟄伏已久的黃禍論便因俄國國家身分定位調整，而自上而下地逐漸於俄中互動裡初露復萌端倪。^⑪

1990年代中後期，俄國內部隱諱的身分隔閥也完全甦醒，地方昔日被剝削與邊緣化的經驗在模仿與習得下更為強化，並鞏固既有的身分認知隔閥，黃禍論此時更成為地方操作抗衡中央的槓桿。面對脫韁野馬般的地方勢力，身處俄中關係與國內互動交集的莫斯科，對於黃禍論僅能更加低調。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至此因而自下而上地完全復萌。

能動者在不同情境結構裡的身分自然可能不同，但在不同情境卻必需面對同一事件時，卻有習得身分、認知與利益後，再轉換、移植至他處的可能。普京繼任總統後，處於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交集的莫斯科，除於國內習得地方操作黃禍論衝撞聯邦體制規範的認知，更警覺到遠東區當地黃禍再起的隱憂，因而再造聯邦體制規範，與地方再現自我與他者重新定義上下隸屬的身分關係，並適時推動境外俄人返鄉與加強遠東區開發，以維持俄人在當地的一定數量，更導入身分取向的移民法規，匡正在遠東區的中國移民客工身分，從而防堵黃禍再起，而非著眼於俄中經濟合作物質利益取向的最佳化路徑抉擇。

註⑩ 拉林即曾指出拜黃禍論蔓延之賜，俄國便能順理成章地奉行親西方政策，向歐美靠攏。參見 Виктор Л. Ларин (拉林), *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90-х: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90年代前期的中國與俄屬遠東：區域互動難題)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8), с. 73.

註⑪ 如拉林即推斷俄中邊境貿易 1994 年的重挫，實為莫斯科的刻意操作。他觀察到中央除罔顧地方抗議而對中國人實施入境簽證外，又為莫斯科的進口商提供關稅優惠，讓其得以大量進口商品再銷往遠東區。如此一來，中央財政得以增加，但地方邊境貿易卻因此大受打擊，在俄中兩國貿易的份額由 22.6% 暴跌至 7.1%。參見 Ларин,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кто же будет отстаивать наш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 Взгляд с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 22.

但莫斯科對聯邦體制規範的再造僅具限制性效果，並無調和身分屬性隔閡的構成性效用，亦即僅止於集體權威而未至集體身分認同效果。爲了重新掌控地方，莫斯科刻意排除聯邦憲法規定的聯邦主體身分平等，並忽視地方對價廉中國商品的需求，而訴求大國再起，使己所主導的規範內化於國家體制。但國內體制規範結構亦僅剩自上而下的單向建構，中央與地方之間並未能交互主觀建構、調和彼此屬性。

在俄中關係裡，兩國雖因反霸與倡議多極化而在國際上身分立場相同，但基礎並未穩固，況且分屬不同種族的兩國欲調和彼此屬性本即不易。俄中關係若真正已達集體身分階段，便不會有所謂的黃禍恐懼。儘管如此，兩國長年互動後所建構出彼此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爲敵」仍發揮相當程度的限制性作用。再者，莫斯科於國內習得黃禍再起的認知，體認其於國內和國際環境下的身分，以及對情勢的判斷而轉換至俄中關係後，亦認清兩國交惡將更不利於遠東區開發，俄國反倒有失去遠東區的可能。莫斯科因而秉持於國內習得的身分、認知，回歸俄中兩國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爲敵」，並刻意忽略黃禍論，由國內面至國際面，自下而上地與遠東區、中國兩者反向建構彼此於其間對應的身分，並持續與中國推動公共外交、進行文化交流，希冀能消弭黃禍論的復萌。

是故，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此兩組觀念結構，初始爲自變數促使因變數—黃禍論復萌，黃禍論之後又成爲自變數，反向影響促使其復萌的兩組觀念結構。因此，我們能見到能動者轉化在不同層次、不同情境與不同身分下所習得的經驗與認知，進而決定其利益與行爲。此即本文由黃禍論案例釋疑所推導出的「跨層次／情境習得轉化」論點，當然若欲作爲通則，未來仍有待更多的實證案例爲其印證。

二、未來可能發展

（一）觀念變數主導發展，又鞏固物質變數

俄中兩國間的身分與認知需獲得調和，而俄國內部的疏離以及遠東區當地俄人與中國人間的隔閡亦須趨同，黃禍論方有減輕、緩和，乃至於消弭的可能。

然而，俄中兩國當前所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爲敵」仍未澈底到位，尚不足以調和彼此身分屬性的歧異，從而消弭俄人的黃禍疑懼。俄國內部的互動進程雖已從簡單習得逐漸發展至複雜習得階段，但中央與地方在反覆互動後，卻創造出地方不信任中央，視中央承諾爲欺騙的認知。

2012 年 1 月，欲重返克里姆林宮的普京迫於總統大選選情低迷而做出若干改革承諾，其中即包括恢復地方首長直選，並由時任總統的梅德韋傑夫向國家杜馬提交法律草案。但新法案仍有但書規定，亦即地方首長若有貪腐或涉及其他利益衝突，抑或違反聯邦或地方的法律，總統仍可免除其職務或將其召回。是故，即便地方首長選舉恢復爲昔日的直選，其間的改變亦僅是形式，中央對地方的箝制依舊不變。

莫斯科若持續再以上對下的單向可控式民主體制維繫國家統一，長此以往，促成黃禍論復萌的變因之一—中央與地方的身分認知隔閡，非但難以消弭，反倒還有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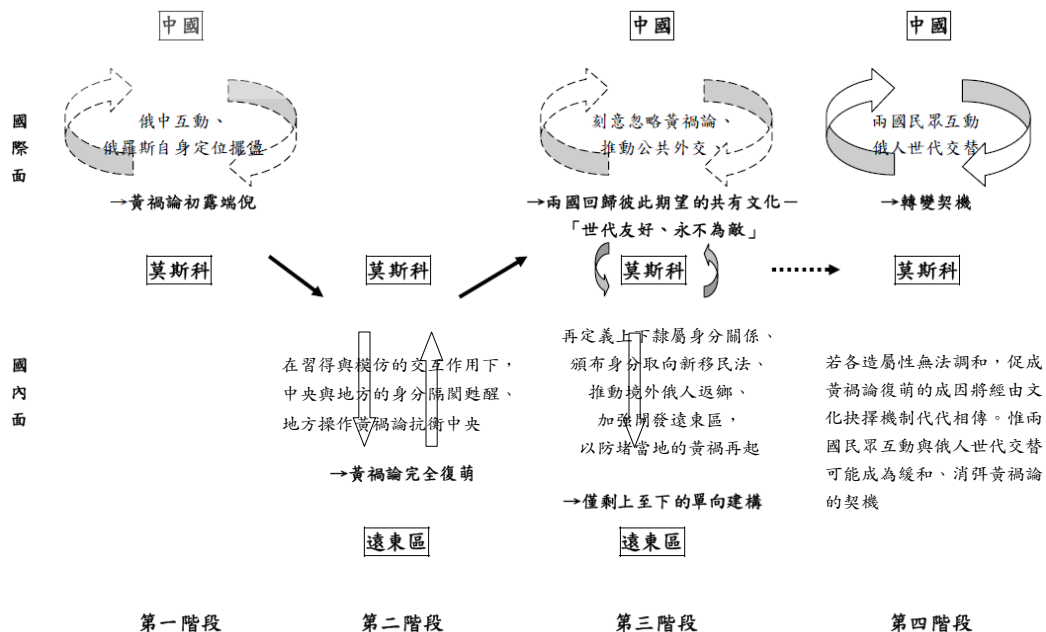


圖 1 黃禍論的復萌與未來可能發展，以及莫斯科、遠東區、中國三者間的互動反應

說明：

- 1.在第一與第三階段裡，中國和莫斯科互動的虛線箭頭表示，兩國無法有效調和彼此身分屬性的歧異；第四階段裡兩國民眾互動和俄人世代交替的實線箭頭，表示此時方有可能產生調和身分的建構性效果。至於第三階段過渡至第四階段間的虛線箭頭，則表示未來有如此演變的可能。
- 2.在第二階段裡，莫斯科與遠東區互動的箭頭表示，彼此充分了解對方的認知和意圖；第三階段莫斯科與遠東區的互動僅剩單向箭頭則表示，此時僅剩莫斯科自上而下地單向建構彼此關係，遠東區的民意與訴求無法充分獲得中央的了解與採納。
- 3.第三階段處於俄中互動與俄國內部互動交集的莫斯科，其與中國和遠東區互動的雙向箭頭，代表莫斯科於國內習得地方操作黃禍論與遠東區當地黃禍論再起的隱憂後，因而再造聯邦體制規範與地方重新定義彼此身分，並刻意忽略黃禍論，同時與中國推動公共外交，以回歸彼此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為敵」。

的可能。俄國內部的互動進程能產生構成性效果，使中央與地方屬性趨同而不再是「國中之國」^⑩後，黃禍論才有可能緩和或消弭。在俄國內部微觀結構屬性調和前，黃禍論仍將持續與其依附存在的雙重觀念結構交錯地建構。

俄國內部互動進程的變化尚需視其內外部變因而定。內部變因端賴互動進程裡角色身分的內化程度為何，原因在於角色身分能對客觀地位起主觀承諾效用。只要俄國內部微觀結構的變化，亦即聯邦體制規範的反饋不超出相對於國家利益而言的容許範

註⑩ 「國中之國」之說，乃是作者於 2007 年 6 月時訪問來自遠東區濱海邊區之在臺俄人所獲悉。受訪者為畢業於遠東國立大學的 K. Oxana，其表示俄羅斯實為「國中之國」，一為首都莫斯科所在的「俄羅斯」，另一則為莫斯科以外的「俄羅斯」，中央的考量有時未必顧及地方。作者田野調查期間，亦曾聽聞許多來自歐俄與西伯利亞欲取道海參崴前往他處的俄人，提及在俄羅斯同時有兩個俄國並存，而莫斯科正是自成一格的「俄羅斯」，顯見「國中之國」之說在俄羅斯有相當的普遍性。

圍，中央與地方便不會質疑既有的身分定位。在俄國內部，地方曾藉由對體制規範的衝撞，以獲致身分的平等和更公平的利益分配，但最後卻是莫斯科質疑地方的訴求，並再造聯邦體制規範以掌控地方。

就社會目的而言，莫斯科訴諸大國情感與民族意識的社會意義於民眾，以維繫國家統一；遠東區則自認受中央忽略，並意識其未來在於和亞太地區的整合，而漸有「脫歐入亞」的離心傾向。因此，莫斯科與遠東區彼此的身分認知仍有隔閡，社會目的更是難有交集，兩者作用於聯邦體制規範的反饋，已超出國家利益能容許的範圍。

外在變因即為體制規範的結構性制約，行為者即便圖謀改變也會受制於既有規範。以近年實質排華的移民法規為例，遠東區被迫接受衝擊其民生經濟的政策，自亦為體制規範形塑的角色所致。只有在足夠的聯邦主體圖謀改變，並超越集體身分轉化的臨界點，才可能導致結構層次上共有觀念的轉變。但在當前中央與地方缺乏雙向互動的情況下，各聯邦主體已受制於體制規範，難以促成外在變因的變化。

在俄中關係裡，合作的物質利益並未能減輕、緩和黃禍論，反倒鞏固此一恐懼。在俄國內部，原本的物質利益分配不均加上觀念結構－聯邦體制規範的影響，讓遠東區的離心傾向益發強烈。在身分的抉擇上，更有半數民眾將地域屬性置於民族屬性之前，而且呈現膠著狀態。因此，遠東區的集體身分仍處於競爭階段而暫時難有變化，莫斯科在俄中關係的努力亦未能切中癥結而落實於基層，黃禍議題在遠東區每逢選舉便被候選人用以攻訐對手即為一例。倘若各造屬性無法調和，促使黃禍論復萌的成因將經由社會化（Socialization）－文化抉擇（cultural selection）機制而代代相傳。

（二）轉變契機

多數俄中兩國學者雖傾向將實質排華的移民法規單純化，認為兩國充其量僅是在若干方面存在問題。然而，在普京於 2012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前所發表的「俄羅斯與轉變中的世界」（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一文裡，我們卻能了解到俄人對中國移民客工黃禍的戒懼迄今仍在。普京論及中國因素時，除指出中國經濟增長並非威脅，俄羅斯反而要合理地運用中國潛力，以提升西伯利亞和遠東區經濟外，並表示中國並無爭霸野心，北京其實也贊同俄羅斯建立平等世界秩序的看法。對於當前俄中關係與未來的發展，普京更指出：⑩

我們已解決俄中關係的所有重大政治問題，其間包括最重要的邊界問題，並已建立牢固、有法律文件約束的雙邊關係機制。兩國領導人也達到前所未有的信任水平。此有利於我們與中國人民本著真正的夥伴關係精神，在務實與互利的基礎上行事。現已建立的俄中關係模式是非常有前景的。

註⑩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с. 1.

當然，這並不意味我們與中國毫無問題存在，還是存在若干小摩擦。我們在第三國的商業利益並不總是一致，正成形中的貿易結構與低水平的相互投資也總未盡如人意。我們將密切地關注來自中國的移民潮。

普京扼要地指出俄中關係的前景與潛在問題後，卻又特地表示未來將密切注意來自中國的移民潮，這樣的宣示與莫斯科四年前為因應總統大選，而實施身分取向且實質排華移民法規的用意實無二致，目的皆在於贏得更多選民的認同。何況普京欲重返總統大位所面臨的群眾反彈聲浪，更為其前所未見，故普京刻意就俄人關切的中國移民問題表態，自也不足為奇。

由此可見，俄人對中國移民黃禍的戒懼，絕非過往雙方那樣輕描淡寫即可一語帶過，黃禍論並非子虛烏有，僅是伺時而動。^⑭儘管如此，我們在兩國民眾的互動往來裡，似乎又能發現轉變契機。

其因即在於，當莫斯科推動境外俄人返鄉、頒布移民法規匡正境內中國移民客工身分，以防堵黃禍再起並同步加強遠東區開發之際，俄人早已在和中國人的互動裡啟動社會化進程。在俄國當局希望培養俄人經商能力取代中國人之前，遠東區俄人已展開模仿與學習歷程。中國商人被驅逐後，當地民眾因欠缺民生物資，也效尤中國人的穿梭貿易模式至中國攜貨再返回販賣。^⑮在長年耳濡目染下，俄人的若干特質因而也逐漸與中國人趨同。

遠東民族所就當地民眾對自我與周遭鄰居觀感的調查，可供我們探知遠東區俄人與中國人互動後，對於彼此的情感歸屬與評價。在許多可歸諸於亞洲人的特質，尤其是中國人的指標上，俄人雖仍不及其亞洲鄰居，但我們卻能發現俄人這十餘年間也在逐步自我調整中。如在「有企圖心」、「狡猾」、「侵略性」、「有禮貌」與「負責」等項目，遠東區俄人顯然在互動裡逐漸被中國人同化，若干特質不僅逐漸趨同，有的甚至還迎頭趕上。（參見表 13）

此外，在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亦能探知，民眾對俄中經濟合作的態度也逐漸正向變化，認為彼此互蒙其利的比例逐年上升；（參見表 14）而該全國性調查數據的 2009 年部分，亦與個人於遠東區所探得的趨勢極為相近。^⑯此除顯示俄羅斯內化其於俄中戰略夥伴關係角色身分的正面成果外，也代表莫斯科訴諸該角色身分一作為「中國的戰略夥伴」與地方互動的一定成效。

註⑭ 另一例證亦能證明俄人對中國移民黃禍的戒懼。健行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傅仁坤教授曾訪問定居於俄國數代之久的漢人後裔。傅仁坤教授指出，根據這些漢人後裔的說法，在蘇聯時期除非他們與俄人通婚，在血緣上融合同化，否則仍舊難以被真正接納，甚至於無法取得身分證。傅仁坤教授 2011 年 11 月 26 日於「俄羅斯在東亞：臺、日、俄學者之間的對話」會議的發言。可參見劉蕭翔，「論俄羅斯的『恐中症』—以新移民法針對性為例」，頁 71 之註⑰。

註⑮ 作者 2009 年 9 月於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與烏蘇里斯克的訪察。

註⑯ 2009 年 9 月，作者於遠東區曾就俄人認為俄中兩國在經濟合作裡誰獲益較多的看法作一探訪，所探得趨勢為：認為中國獲益較多的為 40%，認為俄國獲益較多的為 7.5%，認為互蒙其利的為 37.5%，難以回答的則為 15%。

表 13 遠東人認知的東亞居民典型特徵（1997 年、2003 年、2008 年）

	中國人	日本人	朝鮮人	俄羅斯人
勤勉	83/65/71	66/48/51	75/49/46	20/20/16
有企圖心	34/48/46	34/29/24	31/31/26	18/16/20
狡猾	40/41/47	22/11/12	15/17/15	10/15/18
侵略性	20/21/35	7/4/6	7/6/7	11/12/16
有禮貌	7/9/11	52/60/57	14/24/31	4/7/16
負責	8/7/10	36/37/38	20/23/21	9/9/16
誠實	4/2/1	7/13/12	8/7/6	13/20/21
慷慨	1/2/1	1/2/2	3/2/3	65/47/52
單位－%				

資料來源：Ларин, Ларина,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с. 39.

表 14 您認為誰在俄中經濟合作獲益較多？（2005 年、2007 年、2009 年）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中國	53%	45%	40%
俄國	8%	6%	7%
互蒙其利	25%	35%	37%
難以回答	14%	14%	16%

資料來源：摘自“Сосед, Партнер, Конкурент? Россияне о Китае,”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1247 (16 июня 2009), <http://wciom.ru/index.php?id=268&uid=12005>.

由此觀之，兩國民眾長年互動後似乎已形成一套獨特的相處模式，以避免無謂的紛擾。縱然俄人對中國人反感如昔，但在雙方的特質與行為模式日漸趨同下，彼此身分認知的隔閡自然有消弭的可能。兩國民眾的互動他日或許能補足俄國內部欠缺之自下而上的建構作用，黃禍論屆時亦可能逐漸減輕、緩和。

再者，不同世代俄人的觀念認知明顯受其所屬世代的社會化歷程影響。蘇聯解體迄今已逾二十年，二十來歲未經歷蘇聯時期的年輕世代和三十歲以上的世代有顯著的不同。年輕世代勇於面對問題且極具批判力；三十歲以上對生活則普遍感到無奈。歷經蘇聯社會化歷程越久的世代越是消極，但其民族自尊心又越強，對生活雖感無奈卻又洞明世事，顯見蘇聯社會化歷程亦為關鍵影響之一。世代逐步交替或許為俄羅斯真正再起的希望，亦為弭平俄中兩國差距的契機。如此一來，黃禍論自亦有望緩和，進而消弭於無形。

陸、結 論

經由建構主義身分政治角度的切入，釐清促成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復萌之兩組無形觀念結構－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其間的身分、利益聯繫以及黃禍論復萌的歷程後，我們了解到：能動者在不同情境結構裡的身分自然可能不同，但在不同情境卻必須面對同一事件時，卻有習得身分、認知和利益後，再轉換、移植至他處的可能。

莫斯科處於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的交集，在國內習得地方操作黃禍論衝撞體制規範的認知，以及遠東區當地黃禍再起的隱憂後，除訴諸正式法律規範與地方重新定義彼此上下隸屬的身分，以壓制非正式社會規範－地方離心傾向外，更導入身分取向的移民法規，匡正在遠東區中國移民客工的身分，以防堵黃禍再起。習得黃禍論復萌認知之餘，莫斯科體認其於國內和國際環境下的身分和對情勢的判斷而轉換至俄中關係後，亦認清俄中兩國交惡反而更可能失去遠東區。莫斯科因而秉持於國內習得的身分、認知，回歸俄中兩國所期望的共有文化－「世代友好，永不為敵」而刻意忽略黃禍論，由國內面至國際面，自下而上地與遠東區、中國兩者反向建構彼此於其間對應的身分，並持續與中國推動公共外交、進行文化交流，希冀能消弭黃禍論的復萌。此外，側重文化面的公共外交雖然未能讓俄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大幅改觀，但俄人對兩國關係發展看法的正面提升，則顯示莫斯科在不同層次習得認知、身分與利益後，在跨層次與跨情境上轉換的正面成果。是故，俄中關係與俄國內部互動此兩組無形觀念結構，初始為自變數促使因變數－黃禍論復萌，黃禍論之後又成為自變數，反向影響促使其復萌的兩組觀念結構。

黃禍論必須在俄中兩國間的身分與認知獲得調和，而俄國內部的疏離以及遠東區當地俄人與中國人間的隔閡亦須趨同的情況下，其方有減輕、緩和，乃至於消弭的可能。「世代友好，永不為敵」，此一俄中兩國期望的共有文化，雖為彼此帶來消弭身分屬性歧異的機遇，但仍因未澈底到位而無法消弭黃禍恐懼。俄國內部在中央與地方彼此的社會目的難有交集，作用於聯邦體制規範的反饋又超出國家利益能容許的範圍下，地方因而受制於體制規範結構，與中央之間亦僅剩上對下的單向建構，而未能消弭「國中之國」的身分隔閡。由此可見，物質雖是抉擇基礎，但觀念的制約實又更甚。蓋因俄中合作物質利益並未能消弭觀念－黃禍論的疑懼，亦無助於兩國的身分調和，既有的身分認知隔閡反倒鞏固兩國民眾的疏離。在俄國內部，地方在經濟上雖然依賴中央，但物質利益分配不均加上觀念結構－聯邦體制規範的影響，亦使得非正式社會規範－地方離心傾向益發強烈。各造屬性隔閡若未能調和，促使當代黃禍論復萌的成因，將可能經由社會化而代代相傳。

在黃禍論的案例釋疑裡，我們見到能動者轉化在不同層次、情境與不同身分下所習得的經驗與認知，進而決定其利益與行為。此即本文所提出之「跨層次／情境習得轉化」論點，除揭示黃禍論的深層蘊含並對其進行中長期預測外，亦讓國際政治與國

內政治雙向互動的研究得以不再如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所喟嘆是種未落實的隱喻（metaphor）。^⑩

至於莫斯科為消弭黃禍論的復萌，而由國內面至國際面反向建構其間對應的身分，此一歷程無疑正是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所強調的：國家同時在國內與國際兩個領域活動，國家可通過國內行為反應國際事件，亦可藉由國際行為解決國內問題。因此，本文亦能補足溫特當年為發展側重體系層面之國際政治理論，而必須忽略的雙向建構作用。但本文對於觀念甚於物質的論證，又可適時化解新古典現實主義對物質與觀念孰為輕重的迴避，^⑪此即與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同之處，因此能為建構主義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增添新的實徵案例，並作為層次分析學理的補充。

此外，遠東區俄人與中國人互動十餘年後，兩者在若干特質與行為的逐漸趨同，未來倘若能補足當前俄國內部欠缺的自下而上的建構作用，成為黃禍論緩和乃至於消弭的契機，俄中關係的變化將恰如溫特所言之三種無政府文化的轉換，由敵人到競爭對手再到朋友。如此一來，無政府文化的轉換將不僅是靜態地展現於體系層次，而且同樣能相對動態地適用於國家間的互動層次，但此仍有待後續進一步的印證。故黃禍論此一無形觀念，未來仍值得我們持續追蹤觀察。

* * *

（收件：2011 年 11 月 21 日，接受：2012 年 10 月 12 日）

註⑩ 古勒維奇曾於其「反饋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與後續的「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裡，批判多數研究探討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互動的目的，僅為了解後者變化對前者的影響，故此一過程是單向的。因此，在以國內結構充作變數解釋外交政策時，應了解國內結構源於國際體系的程度為何，亦即是否有此必要。現今研究的最大挑戰即在於如何模式化國家彼此間，以及國家與體系間的互動。過去雖有為數不少的經典著作，如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外交與國內政治：雙層賽局的邏輯」（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與他自己的「反饋的第二意象」，但它們多年來仍只被作為一種「隱喻」而運用，距離真正的實際操作仍相當遙遠。參見 Peter A.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 882; Peter A. Gourevitch,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2), p. 322;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78), pp. 427-460.

註⑪ 新古典現實主義雖納入結構現實主義所忽略的理念、規範因素，在本體論（ontology）上採物質、理念二元立場，卻不願論述究竟是物質還是理念因素較多的問題，也不願意論述是國際層次，還是國內或決策層次何者較有影響力。參見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 1、2 月），頁 124。

On Contemporary Yellow Peril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The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Shiau-Shyang Lio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MP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Yellow Peril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spanning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has already become a probabilistic law. It does not fade with time, and has already been the dilemma and the potential negative variabl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e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Yellow Peril from a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politics, and to deconstruct Russo-Chinese relationships and Russia's domestic interaction, because the dual intangible idea structures awakened contemporary Yellow Peril after the Cold War. Such an approach not only reveals the essence of Yellow Peril, but also forecasts its mid- to long-term development. Besides, it attempts to deduce the argument: "learning and transferring across level and mood" by explaining Yellow Peril through Constructivism, so as to make the research on intera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s not merely an unrealized metaphor, adding a new example for the middle rang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and providing a supplement to the level-of-analysis.

The thesis contends that the identities and cogni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must be coordinated. Moreover, Russia's domestic alienation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the Chinese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should be narrowed, and then Yellow Peril may just be mitigated or eliminated. However, the currently shared culture: "To be friends forever and never be enemies," expected by both Russia and China, is not realized thoroughly, and the domestic centrifugal tendency that led to Yellow Peril still exists in Russia. If the properties of each side cannot be coordinated, Yellow Peril will

construct and intertwine with the dual idea structures, and the causes of Yellow Peril may also persis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rough socialization. Nevertheless, after these two peoples interacted for several years,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 of the Russian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have turned out to be more and mo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hinese, and this may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bottom-up construction in Russia. Moreover,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s may also be the hope of Russia's resurgence. If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can be narrowed, Yellow Peril may also be mitigated and eliminated.

Keywords: Yellow Peril, Constructivism, Russo-Chinese Relationship, Identity, Interest

參考文獻

- 弗·拉·拉林，「俄羅斯總統的太平洋倡議與俄中關係」，*西伯利亞研究*（哈爾濱），第 34 卷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11~13。
- 李靜杰，「跨入新世紀的中俄關係」，*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北京），2007 年第 2 期，頁 55~65。
- 述弢、王尊賢、袁堅、范國恩、郭家申等譯，尼基塔·謝·赫魯雪夫著，*赫魯雪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國務活動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
- 〔俄〕B. Л. 拉林，「二十世紀初期和末期俄羅斯遠東政策中的『黃禍』綜合症」，*東歐中亞研究*（北京），1996 年第 1 期，頁 87~91、96。
- 秦亞青譯，〔美〕亞歷山大·溫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您從中國的『俄羅斯年』活動中是否有所收穫？」，*俄羅斯新聞網*，2006 年 11 月 8 日（20：43），http://rusnews.cn/vote/index_13.html。
- 「梅德韋傑夫：兩個國家年的舉辦擴大了兩國的合作」，*俄羅斯新聞網*，2007 年 11 月 5 日，http://big5.rusnews.cn/ezhongguoxi/ezhong_zhengzhi/20071105/41950444.html。
- 董曉陽，*俄羅斯利益集團*（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
- 趙竹成，*俄羅斯聯邦體制的憲政基礎及其衝突*（臺北：韋伯文化，2002 年）。
- 趙華勝，「中俄關係的模式」，關貴河、欒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38~54。
-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 1、2 月），頁 115~140。
-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07~144。
- 劉蕭翔，「俄羅斯『中國年』的公共外交成效評估」，*公共外交季刊*（北京），總第 7 期（2011 年秋季號），頁 35~42。
- 劉蕭翔，「論俄羅斯的『恐中症』—以新移民法針對性為例」，*俄羅斯學報*，第 10 期（2012 年 1 月），頁 65~87。
- Brady, Henry E., Cynthia S. Kaplan,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Ethnic Identity," in Rawi Abdelal,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 eds., *Measuring Identity: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71.
- Gourevitch, Peter A.,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p. 881~912.
- Gourevitch, Peter A.,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2), pp. 309~328.
- Jepperson, Ronald L.,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2~75.
- Katzenstein, Peter J.,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eohane, Robe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98), pp. 379~396.
- Khrushchev, N. S.,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by Strobe Talbott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 Kotkin, Stephe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U.S.A.: M. E. Sharpe, Inc., 1995).
- Kozyrev, Andrei, "The Lagging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 73, Iss. 3 (May/June 1994), pp. 59~71.
- Lukin, Vladimir P., "Our Security Predicament," *Foreign Policy*, No. 88 (Fall 1992), pp. 57~75.
- Lukin, Alexander,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 Century* (Armonk, N.Y.: M.E. Sharpe, 2003).
- Mackenzie, David,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4th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 Co., 1993).
- Medetsky, Anatoly, "Federal envoys, Tolstoshein's comeback impact election," *Vladivostok News*, May 11, 2001, <http://vn.vladnews.ru/Arch/2001/ISS260/News/News01.HTM>.
- Ni, Xiaoquan,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 and Policies towar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Judith Thornton and Charles E. Ziegler eds., *Russia's Far East: a region at risk* (Seattle, Wash.: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p. 375~395.
- Pipes, Richard, "Is Russia Still an Enemy?" *Foreign Affairs*, Vol. 76, Iss. 5 (September / October 1997), pp. 65~78.
- Putnam, Robert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78), pp. 427~460.
- "Russia Hands Over Land to the Chinese," *Pointer*, Vol. 3, No. 6 (June 1996), p. 3.
- Sergunin, Alexander A., "Discus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st-Communism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7, No. 1 (March 2004), pp. 19~35.
- Shakleyina, Tatyana A., Aleksei D. Bogaturov, "The Russian Realis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 Relation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7, Iss. 1 (March 2004), pp. 37~51.
- Su, Fenglin, “Questions Regarding Past and Present Sino-Russian Cultural Exchange,” in Iwashita Akihiro ed., *Eager Eyes Fixed on Eurasi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07), pp. 93~109.
- Wendt, Alexander,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01~108.
- Wendt, Alexander E.,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ishnick, Elizabeth, “The Securitisation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Melissa G. Curley and Wong Siu-lun eds., *Security and Migration in Asia: the Dynamics of Securitis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83~99.
-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2002 года,”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http://www.perepis2002.ru/index.html?id=87>.
- “Дискуссия о том, какой быть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февраль 1993), с. 6~21.
- Караганов, Сергей, “Вперед в Аз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2 июля, 2008, с. 1.
-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часть 1*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7).
- Косырев, Дмитрий, “Путин поставил вопро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блема не в том, на каком языке будут говорить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и, а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осмыс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осквы в этом регионе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2 июля, 2000, с. 1.
- Ларин, Виктор,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б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кто же будет отстаивать наш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 Взгляд с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1 (1997), с. 15~26.
- Ларин, Виктор Л., *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90-х: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8).
- Ларин, Виктор Л.,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фокусе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естник ДВО РАН*, No. 2 (2000), с. 3~20.
- Ларин, Виктор Л. “Китайск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иктор И. Дятлов И. Дятлов под ред., *«Мост через Амур» Внешние миграции и мигранты в Сибири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семинара* (М.; Иркутск: Наталис, 2004), с. 108~122.
- Ларин, Виктор,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опыт,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2 (2008), с. 40~53.

- Ларин, Виктор, Лилия Ларина,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населения, 2008 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No. 1 (2009), с. 33~58.
- Ларин, Виктор, Лилия Лари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ТР в зеркал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прос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No. 1 (2011), с. 49~69.
- Мурсалиев, Азер,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лица: Краевой губернатор пошел по краю,”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Власть*, No. 33 (192), 3 сентября, 1996, с. 22-25.
- Наздратенко, Евгений, *И вся Россия за спино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9).
- “Наздратенко запретил китайским ‘челнокам’ торговать,” *Коммерсантъ*, No. 181 (1363), 22 октября, 1997, <http://www.kommersant.ru/doc/186183>.
- Портя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3 (2004), с. 39~49.
-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5 ноября 2006 г. N 683 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6 ноября, 2006, с. 16.
- П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No. 33, 27 февраля, 2012, с. 1.
- Ры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No. 42, 12 октября, 2005, с. 3.
- “Сосед, Партнер, Конкурент? Россияне о Китае,”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1247 (16 июня 2009), <http://wciom.ru/index.php?id=268&uid=12005>.
- “Стратегия для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 августа, 1992, с. 4~5.